

##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

## 编 者 的 话

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列车，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风驰电掣，奔腾向前，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三年的路程。当初出世的婴儿，今日已成为各条战线的生力军，而飞驰前进的社会主义列车，早已将自己的起点站远远抛在后面。

但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们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光明、美好的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辈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从黑暗、苦难的旧中国变革而来的。只有深切了解过去，才能真正懂得今天。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变化中，最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的历史，对今天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一代来说，就是一部最宝贵，最生动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它使我们懂得如何珍惜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怎样保卫和建设得来不易的社会主义江山。

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上海工人家史选》的目的。

收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四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工人阶级在旧社会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体现了工人阶级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因此，它们不仅仅是几个个人的历史，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阶级的历史。

老工人黄有民，十岁就开始在码头上捡煤渣，当“小野鸡工”，他在旧社会的码头上整整干了二十三年。为了拿到一张进码头的工票，他几乎天天得在浦江两岸一百多个大小码头上东奔西闯，把汗水和热泪洒进滔滔的江潮（《血泪浦江潮》）。韩金妹是个已有近三十年工龄的纺织工人。阶级仇，民族恨，童年时代就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为了生活，她小小年纪，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代替有钱人打“防疫针”；为了生活，她不能不五次投进那地狱般的“湖丝栈”。这些，对于今天的青年一代来说，也许是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但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象韩金妹那样成年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又何止千万啊！在万恶的旧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在剥削阶级手里，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成年地卖命，却只能过着饥寒交迫的被剥削生活（《满腔悲愤忆旧年》）。包耀根师傅的一双劳动大手，是多么能干、多么灵巧啊！它能叫几层楼房那样高大的“万匹机”隆隆欢唱，带着万吨巨轮遨游四海。劳动群众是人类世界的创造者，伟大的工人阶级，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国家的栋梁。可是，在那“乾坤颠倒”的旧世界里，他却只能漂泊四海，走投无路，到处都没法为自己一双能干的手找到一个主顾（《奴隶双手谱新曲》）。寿奎富同志原来是个放牛娃，长年累月地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认识到工人阶

级的历史使命,发愤为革命学习,立志为工人阶级占领文化科技阵地而奋斗不息。他的动人经历,将激励我们每一个革命青年去为革命攀登文化科学的高峰。在今天,它对我们是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的(《从放牛娃到工程师》)。四位老师傅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阶级不愿做奴隶,起来反抗、斗争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本质。

上海,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老一代工人阶级丰富的斗争生活,是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一份十分宝贵的政治教材。现在,《上海工人家史选》第一集在各级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里,我们谨向曾给我们以支持的有关单位和各方面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但是,这项工作现在还只开了个头,第二、第三集还将陆续编下去。希望各方面的有关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继续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搞好这项工作。

现在出版的这本小册子,肯定还有不少缺点,希望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给我们批评指正,以便使以后的几册编得更好些。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 目 录

## 编者的话

## 满腔悲愤忆旧年

-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老工人韩金妹讲家史····· 1

## 奴隶双手谱新曲

- 上海船厂老工人包耀根的家史····· 21

## 血泪浦江潮

- 上海港第七装卸区老工人黄有民讲家史····· 45

## 从放牛娃到工程师

- 上海机床厂老工人寿奎富的家史····· 71

# 满腔悲愤忆旧年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老工人韩金妹讲家史

每天去上班，总可以看到天真活泼的红小兵们背着书包上学去；跨进厂门，又可以听到厂幼儿园里传出的妈妈与孩子喊“再见！”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格外激动。我羡慕孩子们，他们的童年生活多么幸福啊！

提起我的童年，真有满腔的悲愤！我今年虽然只有四十五岁，但有一半岁月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旧社会，那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活地狱，处处是陷阱，步步是火坑，哪里有穷人的生路？那时候豺狼当道、恶魔横行，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在我们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造起了他们的天堂，花天酒地，荒淫无耻；而劳动人民却过着悲惨的生活！我们一家，成年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到上海解放的时候，一家人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个人。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哪一家没有一本血泪史！我不过是千千万万穷孩子当中的一个。

## 逃 难 又 遭 难

我的老家在苏北。听妈妈说，我出生不久，家乡就闹了大灾荒，田里收不回一粒粮，地主却象个索命鬼似的，天天上门催租逼债。天灾人祸，逼得我们实在没法生活下去，爸爸只好

在一个深夜拖着一家老小离开家乡逃荒躲债去。一路上靠要饭度日，历尽艰辛才来到上海。在闸北贫民窟里搭个“滚地龙”住了下来。

上海滩高楼大厦能遮天，商店酒楼数不清，穷人却找不到一口饭吃。爸爸给人家东打一天零工，西做两天小生意；妈妈整天给人家缝缝洗洗；我们几个孩子一年到头赤着脚光着背在外面拾垃圾。就这样，一家人还是挨饿受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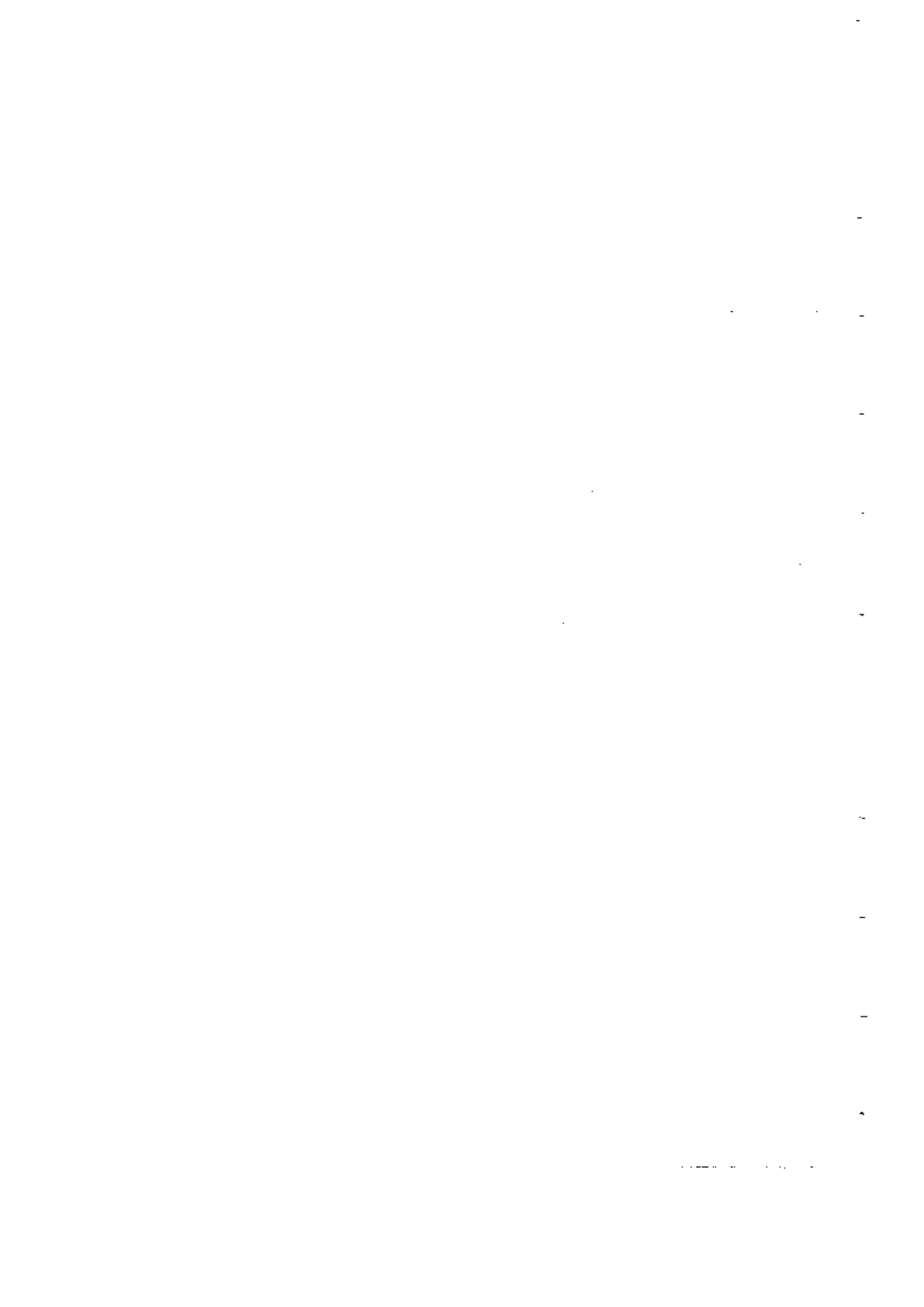
爸爸由于常年忧愁劳累，终于一病不起。我九岁那一年，他抛下我们孤儿寡妇含恨死去。爸爸死后，家境更加困难了，常常一连几天也揭不开锅。妈妈日夜劳累，加上爸爸病死的打击，也得了心疼病。

那个年月，灾难象六月的冰雹朝我们打来。就在爸爸死后不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把闸北一带变成了一片火海。拥挤不堪的棚户区，顿时乱成一片：大哭小喊，呼儿唤女，人们在火光中四处逃难。有钱的人早就搬到英租界或法租界里去了。穷苦人往哪里逃呢？在通向英租界的每一个桥头上，都站着端刺刀的英国军警，不让逃难的穷人过桥。我死死拉住妈妈的衣襟，妈妈手里抱着未满四岁的小弟弟。哥哥扶着年迈的奶奶，随着混乱的人群盲目地跑着。一路上，处处是撕裂人心的哭喊声和惨叫声。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英国租界。但是奶奶和哥哥不见了。听说夜里冲进租界的时候，不少人被英国军警推到苏州河里去淹死了。我们心里很不安，不知道奶奶和哥哥是不是也被害了，可是也没办法打听。所以我们母子三人只好露宿街头，讨饭度日。

后来，我们被赶进了“难民所”。







难民所，难民所，  
一日两餐不饱肚，  
活的进来死的出，  
人间地狱无尽头。

我们住的难民所，就在现在的新闻路小菜场那里。一、二千人横七竖八地挤在那又湿又冷的水泥地上，吃、住、拉都在里面。夜里，挤得连脚也插不下。吃的是一日两餐菜皮稀粥汤，而且每人只能分到一勺子。由于条件十分恶劣，所以难民所里传染病经常流行。每次瘟疫总要夺去一大批穷人的性命。侥幸活下来的，只要有一点生路的，谁也不愿意呆在那人间地狱里活受罪。因此不到半年时间，这里的人就少了一大半，留下的都是象我们这样不能劳动的老人和小孩。

难民所的生活越来越苦，常常一天只供应一餐稀粥汤，整天连热水也喝不到。妈妈病着，我只好领着弟弟出去讨饭、拾垃圾。弟弟虽然只有四岁，却很懂事。平时我们在外面搞到一点吃的，总是先带给妈妈吃，弟弟从来不哭不闹，有时实在饿急了，才拉着我的手叫着：“姐姐，我要喝水。”于是，我就领着他到难民所对面的老虎灶上去要点开水给他。有时在外面搞到一点冷饭什么的，难民所没有炉子也没开水，我们也只好到老虎灶上去要点开水泡一泡吃。日子长了，和老虎灶上的人也就搞熟了。

有一天，老虎灶上的伙计对我说：“小姑娘，朱老板没有儿子，看中了你弟弟，要你妈把你弟弟卖给他做儿子。”

起先我还以为他跟我开玩笑，所以只是笑着不回答。这时候，那个肥头胖耳的朱老板手里捧着茶壶从里面走出来了，他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不跟你开玩笑，回去跟你妈讲一声，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我见他当了真，忙摇头说：“不，我们不卖，妈妈不肯的。”

老板的两条倒挂眉皱成疙瘩说：“真不识相，我可怜这孩子，跟你们这样混下去迟早要饿死的。给他找条生路不好吗？快去跟你妈讲，你妈不会不肯的。”说完，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只“角子”递给弟弟：“叫姐姐带你去吃碗阳春面。”

弟弟不肯接他的“角子”，躲到我背后，拉着我的衣裳，一个劲地催着：“姐姐，回去，回去……”

老板突然发出一阵奸笑露出两颗大金牙说：“小赤佬，我是你爸爸，怎么老子也不认啦！”

我气极了，真想骂他几句。可是又怕以后要不到开水，所以只好一声不响地搀着弟弟离开了那里。

回到难民所，我把这事告诉妈妈。妈妈听了把弟弟紧紧搂在怀里，气愤地对我说：“瞎了眼的狗东西，真狠毒！咱们以后不要再去向他讨开水了，穷要穷得有志气！咱们再穷也不能把小弟弟卖掉！”我会意地点点头。

那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没到老虎灶去讨开水了。有一次，我在外面拾垃圾卖了几个钱，买了两只又冷又硬的米饭饼带回去。因为妈妈有病，我就把两只饼放在小铁罐里，想弄点开水来泡一泡给她吃。可是难民所里找不到开水，因此我只好又上老虎灶去讨。小弟弟一天都没出去了，这时他吵着要跟我出去。为了让妈妈能安稳休息一会，我就带他出去了。

我本来想上别的老虎灶去，可是路过朱老板的老虎灶，给那个伙计看到了，他对我招招手说：“来来来，怎么好久没来啦？你弟弟的事问过你妈了吗？朱老板可催问过我好几次啦。”

我说：“问过了，我们不卖！”

“唉，这也难怪，亲骨肉，谁舍得呀！”那伙计又低声对我说：“不过，你以后可别来这里要开水啦……”

话还没说完，那个老板象个鬼魂似的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见我就大声问道：“怎么样？今天就把小家伙留在这里吧。我出五斗米！”

我忙说：“我们就这个弟弟，死也不能卖。”

“你再去对你妈说，看你们可怜，我出一担米，不卖也要卖！”

“妈妈说了，钱再多我们也不卖！”

朱老板把脸一变，瞪着恶煞似的眼珠吼叫起来：“不卖，今天就别想走！我开老虎灶是让人白喝水的吗？”

我一时呆呆地站着不知怎么对付他才好。小弟弟这时躲在我的背后，偷偷地看着那胖得象狗熊似的朱老板，一边拉着我说：“姐姐，走，走……”

我拎起铁罐要走，那流氓成性的朱老板用水勺猛一记把我的铁罐打翻，两只饼滚到木架子下面的炉灰膛里去了。可爱的小弟弟连忙钻到木架子下面去拾。就在这时，那残忍的朱老板舀起一木桶滚水，“哗”的一下向木架子上泼去。只听到小弟弟发出一声惨叫，扑倒在炉门前的煤渣堆上了。我万万没想到这个野兽会下这样的毒手，眼前一阵发黑，差一点昏倒过去。我用全身的力气，把弟弟从炉灰膛里抱上来。可怜的小弟弟被烫得浑身是泡，两只眼睛顿时肿得象大核桃一样。我心里又急又恨，恨不得把贼老板一口咬死。我一头向老板撞去，想跟他拚！

“滚！臭要饭的！”黑心的朱老板一记耳光打得我眼前直

冒金星，跌倒在地。我挣扎着爬起来，还想同他拚，给伙计拉开了。我只好抱起浑身湿透的弟弟，哭着回难民所去。

妈妈看到这个惨景，哭得昏了过去。周围的大伯大娘们都来帮着把弟弟身上的湿衣服剥下来。看着这样的惨状，没有一个不气愤的。妈妈象发疯似的几次挣扎着要去同那贼老板算账，都被大娘们拦住了。因为那姓朱的是那一带有名的恶霸流氓，同当地的巡捕房都有勾结。我们这孤儿寡妇的，到哪里去和他评理呀！

这以后，弟弟成天发高烧，身上的烫伤也化了脓。母亲拿不出半文钱为他医治，只好日夜守在他身旁。不久，可爱的小弟弟悲惨地死去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短短的四年，就被万恶的旧社会吞噬了！弟弟被害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刻下了仇恨的烙印。

不久，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不幸的消息：奶奶在另一个难民所里病死了……

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家就死了三个人，旧社会到处妖魔横行，豺狼当道，穷人到哪里也逃不了灾难！

## 童工的血泪仇

弟弟死后，我们就离开了难民所。在一位穷乡亲的帮助下，在沪西一个棚户区内住了下来。母女俩还是靠拾荒为生。可是拾荒的穷人越来越多，我们常常一天也挣不到两只大饼钱，只好饿着肚子挨过一天又一天。

我十岁那一年，左右邻居见我们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就想方设法把我们母女俩介绍到玉佛寺附近一家“湖丝栈”（缫丝

厂)去做工。妈妈去拣茧子,我当童工学打盆。

总算找到了一条生路,我和妈都非常高兴。可是一进厂,幻想马上就破灭了。

这个厂规模不大。一排矮平房里摆着十几台老式机器。靠墙边摆着一只只锅子,锅子里滚开的热水冒着雾气,整个车间雾腾腾的。几十个和我一样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伸着两只手在滚开的锅子里捞着茧丝头。又瘦又黄的脸上挂满了水珠,分不出是汗水还是泪水。

进厂第一天,“拿摩温”就叫我和那些小姐妹一起“打盆”:把茧子放在沸水里煮,等茧子煮烂了,就用手伸进泛着气泡的开水里,把一只只茧子上的丝头找出来,然后交给车上的工人去抽丝。我长得矮小,只好在脚下垫一只木箱子干活。茧子在锅子里“咕咕”地翻腾着,十个指头伸下去捞茧子的时候,烫得我眼泪直流,可是一刻也不能停。如果慢了,跟不上下一道工序,被工头看到了就要挨打。有时还用开水往我们身上泼。干着干着,我老是想着被烫死的弟弟,我总觉得灾难也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

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闷热的蒸气叫人透不过气。三、四天干下来,我就累得直想躺下来。十个手指头肿得就象煮熟了的胡萝卜,夜里痛得觉也睡不着。每天一看到那黑洞洞的厂门,我就觉得它好象是一张老虎嘴,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

有一次,我发了高烧,走起路来好象腾云驾雾一样,天旋地转。为了生活,我只好瞒着妈妈去上班。可是站在滚烫的锅子旁边,我控制不住自己,一直是昏昏沉沉的,结果把一锅茧子煮烂了。正好碰到那个肥猪似的老板娘来车间巡查,她一看,不问青红皂白,打了我两记耳光。一面打,一面嘴里还

下流地骂着。我气愤极了，就冲着她说：“茧子煮烂了我赔你，你干嘛打人！”

老板娘看见一个童工敢这样同她回嘴，气得象条疯狗似的，抓起铜勺就朝我身上乱打。一个老师傅见了，忙过来拉劝说：“孩子还小，怎么这样打呢？叫她以后当心一点就是了。”但老板娘一定要我向她求饶。可是我偏不求饶，我说：“她凭什么这样打我？她要是手发痒，回去打自己的孩子好了。”

正好这老板娘不会生小孩，我的话刺痛了她的癞疮疤，她象疯狗似地扑过来抓住我的手，从头上拔下一根银发针就朝我指甲缝里乱刺。我的十个手指头被滚水烫得象烂胡萝卜，怎么经得住这样折磨呢？给她一扎，就痛得昏死过去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老板娘还在一旁恶狠狠地骂着：“你别装死，老娘打死你，大不了花两张芦席钱！”见我睁开了眼睛，她马上又逼我去干活。

我憋着一口气，准备同她对抗到底，但又想到一个老师傅曾对我讲过：“在这黑暗的社会里，地主资本家的心是一样黑，只要我们能活下去，天总会亮的。”于是，我忍着疼痛，咬紧牙关干活去了。

中午，妈妈拎着破饭篮给我送饭来了。我真想扑在妈妈怀里痛哭一顿。但是我又想，这么一来以后她一定不会再让我来做工了。不做工又怎么活下去呢？因此，我只好强忍着把眼泪往肚里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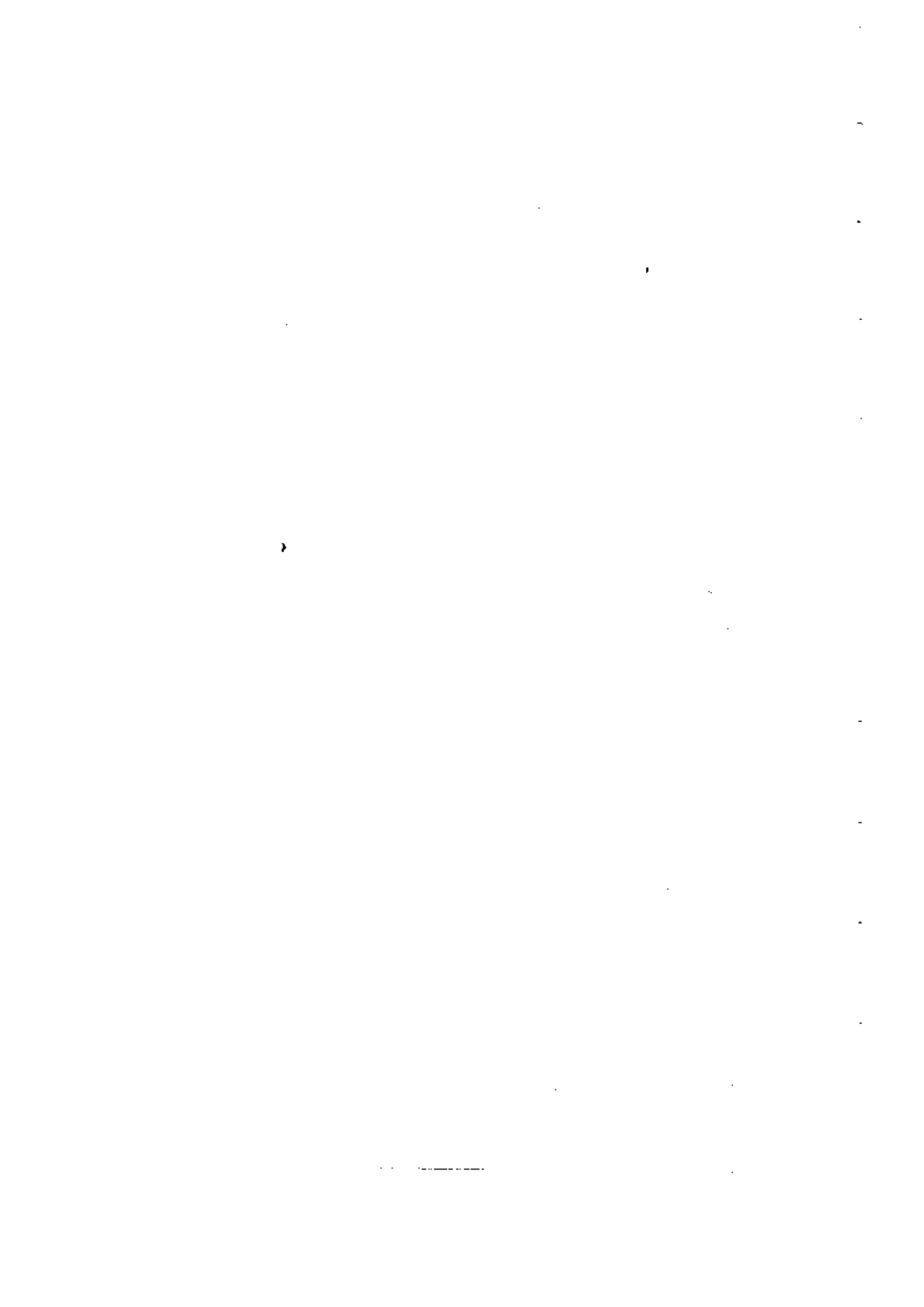
“孩子，吃饭吧。”妈妈把一碗包谷红米饭端到我跟前。

我的手指头被刺得血淋淋的，一伸出来，妈妈就会发觉的。所以我把手背在身后，说：“妈，你放着吧，我现在不想吃。”

“趁热吃下去不好吗？怎么不想吃，你病了吧？”她伸出手







来摸摸我的头，这才发现我头上有好几块肿块，就问：“怎么搞的？”

“没什么。”我撒了个慌，“不小心在车头上撞的。”

“不对，”妈的脸色一下子阴郁了，“车头上撞顶多一两块，怎么有这么多呢？”说着，她又来拉我的手，“把手心让我摸摸看。”

开始我犟着不让她摸，可是到底拗不过她。当妈妈看到我鲜血淋漓的手指时，不禁惊叫起来：“啊！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她再一掀我的衣裳，见我浑身都是血迹，忍不住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似地滚下来。

不用再问，妈妈一切都明白了。最后，她一擦眼泪说：“孩子，回去吧，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能再让你受这个罪！”

就这样，我离开了这家“湖丝栈”，逃出了虎口。

## 穷人的性命不如草

离开“湖丝栈”以后，我仍然跟棚户区的穷孩子们一起拾垃圾，拣煤渣。有一次钻铁丝网差一点给日本鬼子抓住用刺刀戳死。

有一天，我听到一个拾垃圾的小姐妹说，大场飞机场有许多垃圾堆，里面有好多弹壳。弹壳是铜的，很值钱，这倒是一条应急的路子。可是大场是日本鬼子的军用机场，四周日夜都有日本兵站岗巡逻。要是让日本兵发现，不是被枪打死就是用刺刀刺死。这可是个危险的事！但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穷人的生命还不如一棵草，所以，为了生活，也只好冒险去干。我决定瞒着妈妈去试一试。

第一天，我们几个穷孩子走到大场机场，远远就看到机场四周的铁丝网。据说铁丝网上都通着电，人一碰上去就会被烧死。这一天，我们每人都拣到半斤多弹壳，换到了四、五斤米。

我高兴地拎着米回到家里，把米包袱一打开，妈妈吃了一惊，问：“这是哪里来的？”

我知道，妈妈如果知道了真情，明天肯定不会再让我去的。所以只好撒了个谎，说是从一个垃圾洞里拣到了不少破烂换来的。但她还是再三叮嘱我：“我们穷，一定要穷得有志气，不正当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去沾边。”

两三天后，后弄堂有个怀孕的妇女，叫桂英，她听到这个消息也想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告诉她，这是个危险的事儿，她又怀着孩子，万一有个闪失可不得了。但她说，丈夫生病半个多月不能出去拉黄包车了，家里实在没吃的，能出去弄一点米给病人熬点汤喝也好。只有穷人才能体会到穷人的苦处，所以我们只好同意了。

这一天，我们在飞机场南面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个碎砖瓦堆，里面弹壳真多，我们拚命用手挖着，我的手指头都挖出血来了。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挖的时候，发现两个鬼子兵扛着枪不声不响地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连忙对姐妹们喊了一声：“鬼子——快跑！”姐妹们一听，赶忙扔下篮子，搀着桂英，拔腿就跑。

桂英跑了几步，怕连累我们，要我们几个先跑，她说：“小妹妹，你们快跑，我不怕他们！”我们怎么能扔下她不管呢？可是桂英挣脱了我们，要我们快跑，我们只好依了她。没想到，不一会儿，日本鬼子追上了她。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匪徒赶上

去，一脚将桂英踢倒，接着，一刺刀就把她的肚肠连同婴儿一起挑了出来。那个惨状啊，至今想起来全身的毛发还会竖起来啊！想到惨死的弟弟，我觉得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反动派，对我们劳动人民都是一样凶狠残暴。

这件惨事发生后，妈妈死也不肯放我再到那里去了。我只得背着破筐去拾垃圾，常常空着两手回来。生活还是过不下去，怎么办呢？实在无路可走，母女俩就只好去“卖打针纸”。这可是一件卖命的事啊！

什么叫“卖打针纸”呢？这里要解释几句。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采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造成瘟疫流行，人民大批死亡。但是在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以后，又感到这对他们本身的生命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就强迫中国人打“防疫针”。一年要打好几次。中国人凡是经过有日本兵站岗的关卡，都要检查“防疫证”。没有“防疫证”的，当场就要戳一针。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屠杀。因为他们的所谓“防疫针”，不仅药水的质量极其低劣，而且打针时根本不换针头、不消毒，有许多人打了针以后就发高烧，有的因为受感染而死亡。因此人们都把打这种“防疫针”看成是一场灾难。有钱人为了逃避这种灾难，就出钱叫穷人代他们去打，而把领到的“防疫证”交给他们。有些穷人迫于生活，就只好去干这种卖命的行当。那时，卖掉一张“防疫证”折合着可以换到半斤多一点六谷粉。所以，有些卖打针纸的人，常常一天要戳上三、四针，因此就长期发着高烧，有的甚至当场倒在马路上死掉。

开始，妈妈瞒着我去干这种卖命的事，后来，被我发觉了。我心里难受得象猫抓一样。妈妈年纪这样大了，身上又拖着

病，我怎么能让她去受这样的罪呢？后来，我也瞒着妈妈去“卖打针纸”，只说是拾垃圾卖的钱。

有一次，我背着破筐在外面跑了整整一上午，连一只大饼钱都没搞到。眼看这一天又得饿肚子了，我便咬咬牙一连跑了三个打针站打了三针，换了两斤左右六谷粉钱，就急急忙忙赶回家去。在快到家的一个十字路口，忽然听人说前面马路边有个老大娘昏死过去。我过去一看，就是我的妈妈！我不顾一切，一头扑倒在妈妈身上，死命地哭叫着、摇撼着。几个过路的穷人同情地围上来帮我抢救。还有两个米店的职工给我端来了一盆冷水，泼在妈的脸上，又灌了些温开水，这样妈妈才慢慢地苏醒过来。这时候我才知道，妈妈一上午在两只膀子上连扎了三针，卖了几个钱想到米店去换点六谷粉。可是前次打了针热度还没有退，怎么经得起这样连扎三针呢？所以，还没走到米店门口，人就昏倒了。

我扶着妈妈回到家里。妈妈从口袋里摸出钱要我赶紧去买六谷粉，怕去迟了又要涨价。我接过钱，就往米店奔去。

这时，我才觉得头炸开似地疼痛，全身火辣辣地发起烧来。两只膀子痛得一点也抬不起来。但心里却估算着，怎么样混过这几天。

来到米店，我叫伙计称六谷粉。等他称好六谷粉，我一摸口袋，钱不见了！我翻遍全身也没找到。很明显，钱在路上被人弄走了。我急得浑身冒汗！我恨透了！我想：天这么高，地这么大，为什么就容不下我们这一对孤儿寡妇！

回到家里，我泣不成声地向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听完，象一个木头人一样，气得半句话也说不出。过了半天，她才愤愤地说：“这世道，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啊……。”

## 无形的锁链

左邻右舍的穷乡亲们，为我们这一对孤儿寡妇操碎了心。有几个邻居大娘劝我妈，让我到“湖丝栈”去做工。实在没别的路可走，于是，妈妈就同意让我第二次进了“湖丝栈”。

一提起“湖丝栈”，我的心就蹙起来，那个可怕景象就浮在眼前。可是，我又想，也许换一个厂会好些吧。就这样，我又进了“湖丝栈”。

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剥削者的心都一样狠。在第二月“湖丝栈”里，我虽然辛辛苦苦地干，但也只熬了七八个月。将近过年的时候，由于我挨了冻又常年劳累，得了病。在带病干活时，又煮烂了一锅茧子。狠毒的工头把一锅煮烂的茧子捞出来，倒在我头上，还硬逼着我披挂一头烂茧子去游车间。他借这个机会威吓小姐妹们说：“谁煮烂了茧子，她就是榜样！”他们就是这样残酷地折磨我们劳动人民！

第二天，我躺在地铺上，再也起不来了。新年里，有钱人家大鱼大肉地吃着年夜饭，我饿着肚子在草棚子里发高烧，头上被烫出的水泡化了脓，流着黄水……

“湖丝栈”里童工的生活，真不是人过的啊！可是，罪恶的旧社会、残酷的剥削制度就象一根无形的锁链束缚着我们。不砸碎这锁链，我们到哪里也摆脱不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在那以后的两年里，我又先后三次进出了三月“湖丝栈”。

第五次进“湖丝栈”，我已经十三岁了。当时流浪在外的哥哥带着一身重病找到了我们。哥哥的回来，更加重了我们的负担。妈妈又生着病。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人家到嘉兴一家

“湖丝栈”去做包身工。包身契订的是三年，讲好预先可以拿些安家费。为了给妈妈和哥哥治病，我咬着牙关去了。

离家时，妈妈含着眼泪再三叮嘱我要好好熬过这三年。可是，我在这家“湖丝栈”也只撑了四十多天。由于劳动和食宿等条件极端恶劣，不久就得了疟疾病。加上浑身又生着疥疮，天天发寒热“打摆子”。一个多星期病下来，我瘦得简直没个人形了。有一天，我实在做不动了，就去找工头要求歇一天，而且说按他的规定以后补工给他。可是那工头却冷笑着对我说：“歇一天？到这里来是叫你当小姐的吗？”

我还想说几句话，可是人却瘫了下去。

“看来你是骨头发痒了！”工头瞪着眼睛，拿起铜勺子要打我。我听了这话，硬压着的怒火腾的升了起来，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我横了心：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好受！一时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猛地站起来，趁他还没直起腰来的一刹那，我端起那只滚开的锅子，连锅带水一下子扣在工头的狗脑袋上。趁他“妈呀”、“爹呀”鬼叫的时候，我拔腿就向厂外奔去！

我跑进一条弄堂，差一点迷失方向。幸亏得到一个摆香烟摊的老妈妈的指点，才从死胡同里拐了出来。真是奇迹，我竟一口气奔了二、三里路。当我停下来回头看见没有人追来的时候，立刻就一头栽倒在河边的芦苇丛里去了。以后，什么事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透黑。我捧起冷水喝了几口，就一路上要着饭，经历千辛万苦，回到了妈妈身边。

.....

在我们劳动人民毫无权利的社会里，我逃出了第五

片“湖丝栈”，却逃不出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过了一年，我又不得不来到内外棉十三厂（现在的上棉一厂）做工。在我进厂的第一个星期里，就亲眼看到，一个青年小伙子因身体不舒服打了个瞌睡，被日本领班打得当场口吐鲜血，两三天后就死去了。在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的苦难真是数不清说不尽啊！天下有多少穷人和我一样，为了吃口饭而在无形的锁链下挣扎着！

### 砸碎锁链永革命

春风起，飘红旗。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我们工人阶级翻了身，成了国家主人。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大会，斗恶霸，背起枪去抓反革命，自己管理工厂。过去被人看不起的工人，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世界真是整个地翻了个身，我们在睡梦当中也会笑出声来。

我个人的生活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爱人是个共产党员，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光荣地参加了党。大孩子参加了工作，小的在上学，多么幸福啊！我心里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无限地热爱新社会。但长期来我只有一个报恩思想，到厂里就拚命地干，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我也顶。总觉得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尽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哪！听到谁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一点不利的言行，我就红着眼睛同他干。可是我却识不透那些口头上讲马列主义，实际上搞修正主义的人的真面目。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开始懂得了，干革命不能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还要有革命的理论指导，要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



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这样就会上当受骗。但是在旧社会，我根本没进过一天校门，解放后，由于自己头脑里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影响，认为工人只要努力做工就行了，学不学马列主义关系不大，总不肯下决心学好文化，因此现在学马列感到困难很大。我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以后，决心努力学好文化，有了文化才能学好马列。懂得了马列主义理论，才能分得清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正确路线；才能真正去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对我来说，学文化的困难当然不少。身体不好，眼睛也有毛病，记忆力差，又有家务。学一个字，常常前学后忘。但我想，这不是简单的学文化的问题，而是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所以就下决心地学、使劲地钻。眼睛不好，上课时我就坐在第一排。黑板上的字看不清，我就去配一副眼镜，老师也为我把字写得特别大。记忆力不好，我就把生字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放在口袋里，逢人就请教，有空就温习。这样坚持了一年多，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识了一千多个字。这样，不但能看报，而且还能自己写信、写大批判稿子。现在除了学文化，我每天回到家里还坚持看一、二页《红旗》杂志。《共产党宣言》等六本马列著作，我买了两套，一套自己学，一套送给小组里的小青年，请他们当我的老师。他们读，我捧着书看。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我们子孙万代不吃二遍苦，我真是越学越想越有劲。当然，我这不过是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万里长征迈开的第一步！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工人写作小组整理

# 奴隶双手谱新曲

——上海船厂老工人包耀根的家史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擂响了大造船工业翻身仗的战鼓。上海船厂的工人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三千吨小船台上造出了万吨巨轮“风雷”号，在设备简陋的车间里造出了本厂第一台一万匹马力的低速重型船用柴油机。

这是多么难忘的一天！就在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时候，上海船厂的轮机车间里，那台本厂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万匹机即将胜利动车鉴定了。

在这欢乐的时刻，有一位年近六十、头发脱光的老年工人显得比谁都忙碌、紧张。他围着那一台楼房似的机器转来转去，仔细地检查着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零件。这位老师傅眼睛布满了血丝，显然好几夜没有睡觉了，但他精神抖擞，毫无倦容。他和小组的老师傅简短地交换了最后一次意见后，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满车间的红旗和那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庄严地发出了动车的命令：“开！”

空气压缩箱里的冷气“丝”地一声响，曲轴带着万匹机的

飞轮转了起来。不一会柴油冲进汽缸，轰隆一声，爆炸开来，产生一股强大的动力，万匹机轰隆轰隆地欢唱起来了。

车间里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但那位老师傅对这一切似乎都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他全神贯注地站在操纵台前，看着上面的仪表。仪表上的指针顺着数字圈儿嘀嗒嘀嗒地跳动着。当指针跳到“115”转——这个表示万匹机达到技术标准的数字时，他的眼睛润湿了，一颗晶莹的泪珠落在他的衣襟上。

一位生产指挥部的同志走到他面前，递过一个本子对他说：“包师傅，请您在这上面签字吧。”他翻到了那一页，上面写着几行清晰的字：“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正，我厂第一台万匹机胜利动车鉴定。”

“签字，往哪里签啊？”这是包师傅头一回碰到的事呢。“就签在这上面。”生产指挥部的同志指着“工人代表”一栏说。

包师傅用沾满油污的双手接过本子，抓起钢笔，在那历史性的文件上写下了三个端端正正的大字：“包耀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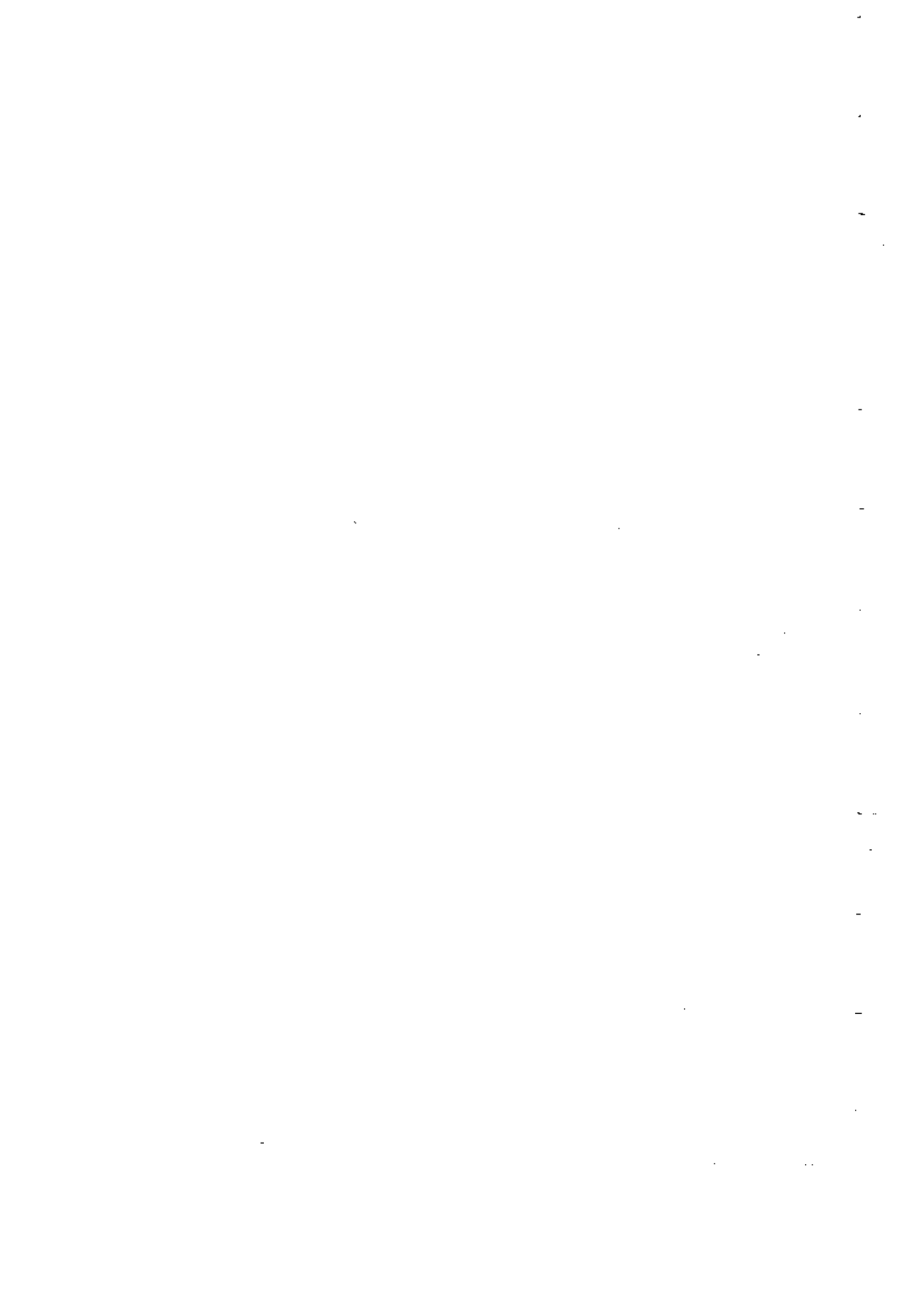
包师傅签完字，习惯地搓搓手，蓦然，他接触到两个断手指，不由地心潮翻滚起来。啊，这双长满老茧的粗手啊，这双残缺不全的手啊，你给包师傅留下了多么难忘的记忆！

## 二

一九二九年，四面环海的浙江金塘岛上，雪花飘飘，寒风嗖嗖，又一个冬天来到了。

在一间东歪西倒的茅草屋前，十五岁的包耀根背着一条破棉絮，提着一只塞了几件破布衫的包袱，准备上路了。





阿爸瞧着小小年纪的儿子阿根，真有满肚子的话儿要跟他说明啊！

阿爸要说些什么呢？他想说：阿根啊，不是阿爸、阿妈忍心让你受苦受难去，是故乡的咸海苦水养不活你啊！

阿爸七岁那年，他那个做穷木匠的父亲，在一次干活时被斧头砍伤了腿，没有钱医治，活活地痛死了。阿爸个头还没有牛背高，就到当地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霸徐大善家去当了放牛娃，稍大些便做了长工。阿爸有一副好身板，有一双勤劳的手，他不甘心自己苦难的长工生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带着妻子离开了金塘岛，要另外找一条生路去。

旧社会的劳苦人民，纵使逃得出荒岛苦海，也逃不出受压迫遭剥削的命运。阿爸渡海来到了镇海。他磨破了九双草鞋，最后还是只能到绰号叫“快发财”的地主家里去做长工，仍然是地主的奴隶，他生下的阿根，也就成了地主家的小奴隶。

阿根八岁那一年，有一天“快发财”假惺惺地对阿根的阿爸说：“你在我家做了十多年帮工了，现在总算你的运气来了。我在海边的那二十几亩地，今年还没有户头，就让你独立一个门户，这也算尽了我做东家的一片心意。”阿爸说：“我屋没一间，锄没一把，这个田怎么种呢？”“快发财”说：“屋是现成的，农具也不缺，都折个价卖给你，价钱可以便宜些。”说着把算盘拨得“的笃”响，折价二百元。阿爸思忖着：能租上田，总比做长工强，拚死拚活干他几年，多流点汗，多打点粮，还清了债，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了。于是他咬咬牙答应了。

海边土地碱性大，又是块生地，下种、管理、施肥人工多，花的力气比一般田地多一倍，收成却只有人家的一半。身强力壮的阿爸，从清晨干到月亮出，拚着命地干，一副扁担不离肩，

硬是被压成了罗锅腰。阿妈刚刚生下阿根的妹妹，在月子里也下地帮着干活，结果累出了大病，瞎掉了双眼。这样，一家人一年辛苦下来，收成倒也不错，打了七千多斤谷子。哪里知道，“快发财”又把算盘噼哩啪啦一打，每亩地要交一百八十斤谷子的租，再加上借债的利息，黄澄澄的谷子全部进了他的粮仓，阿爸还得再向地主借口粮。

这时，阿爸才知道自己上了“快发财”的当。阿爸气难平，很难消，可是在那个世道向谁去说理呢？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也还不清“快发财”的这一笔阎王债，只好带着一家，逃回了金塘岛老家。从此以后，阿爸便坚定一个信念：不能让阿根再沿着自己的路走，做一辈子长工，当一辈子奴隶。让阿根干什么呢？阿爸东打听西留心，听人说，上海地方大，好挣钱，走在路上也能踢到金元宝。他把心一横，不图儿子发财，只盼儿子的命运能比自己好一些。于是他狠着心向地主借了足足合全家二年半收入的五十元的“押钱”，托在上海的阿根的叔叔，帮阿根找到了一门生意。现在，叔叔来领阿根了。

天边，黑呼呼的云层愈压愈重，苦涩的海风卷着鹅毛般的雪片向茅草屋压来，除了茅草屋的吱吱响声，一切是那么沉寂。阿根看着站在身边默默无言的阿爸和阿妈。他从双亲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说什么。穷人家的孩子懂事也早，祖辈的奴隶生活，在阿根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小小的阿根明白，这一次为了自己出去，阿爸阿妈又背上了一笔阎王债，他们对自己怀着多大的希望啊……阿根想开口说话，可是喉咙里老是象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似的，用什么话来安慰父母呢？

双目失明的阿妈又一次把阿根拉在身边，用一双瘦骨嶙

胸的手，抚摸着阿根的小脸，抽泣着，话不连声地说：“孩子，你身子骨单薄……娘……不放心啊！……你一定要……好好学……”阿妈再也说不下去了，别转身揩着已经滴干了泪水的眼窝。

阿根的眼眶湿润了，他的面前晃过阿妈无光的眼睛，闪过阿爸罗锅的脊背，映过嘴里含着手指的妹妹。他想，自己就要离开这些亲人了，心里不由一阵难过。可是，懂事的阿根还是强打起笑容说：“阿爸、阿妈，你们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你们等着我寄钱回来。”

就在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阿根跟着叔叔上路了，他踏着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走了，在他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脚印。

### 三

阿根跟着叔叔到了上海，穿过数不清的马路，走过无数条弄堂，到了南市一家叫做“鸿翔泰”的铁工厂。

阿根跟着叔叔踏进了一扇黑漆漆的大门，只见里面是一间阴森的厅堂。正中靠壁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关帝像”，旁边两条对联，再上面是一块横匾。桌子两边的太师椅上，坐着两个人。阿根见叔叔上前去跟一个穿着臃肿的棉袍、满脸横肉的家伙说话，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老板吧。

老板张开那对水泡眼，象看货色一样，把阿根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句：“嗯，长得倒蛮长大。”叔叔说：“是啊，乡下穷人家孩子长得粗，吃得起苦！”说着便从衣兜



里拿出一封红纸包来，拆开来“当郎”一声，两块银洋落在那张桌子上。

老板露出一丝奸笑，招了招手。坐在一边的账房先生连忙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关书”，用阴阳怪气的声调读起来。阿根只断断续续地听到：“……三年为限，……师父满意方可……，私逃，向父母追回一切损失……”随后，又是按手印，又是烦琐的拜“师”、磕头。

叔叔走了，临走时留下的一句话，却深深地留在阿根的脑海里：“苦苦熬三年，学得身手艺，才能有个出头日子啊！”

这家厂的老板，是一个靠残酷剥削童工起家的吸血鬼，因为收学徒不用给工钱，一天只管三顿吃，加上几个剃头、洗澡钱，就能对付过去了，所以他收了一百二十多个学徒，没有一个老师傅。在徒工的血汗中，老板盖起了四开间的厂房和豪华的公馆。

阿根做工了。他每天天没亮就要起床，整天干的是挑水、劈柴、烧饭、买小菜，早上替账房先生买点心，中午给老板烫老酒。余下时间就到工场里去做下手（辅助工），锉锉毛头，扫扫铁屑，就这样一直做到晚上十一点钟，连喘气的时间都不给。等睡进“鸽子笼”还不得太平，冬天跳蚤咬，夏天臭虫叮，加上蚊子嗡嗡地围拢来，被咬得浑身是疤。每天吃的呢，早上是一碗发了霉的薄粥汤，没有菜，每天只给一根萝卜干，还得在月规钱里扣。老板在外面叫得很响：“鸿翔泰”伙食特别好，一天二干一稀管吃饱，端午吃米苋，时鲜货学徒照样吃得上。阿根他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饭呢？是虫蛀过、水浸过的米，放到锅里煮成粥，上面浮满黑头虫，烧好热饭一捣锅，又酸又臭，不用说吃，就是闻一闻那味道也会令人作呕的。从端午到九

月重阳节一直吃米苋，米苋老得象树根，还要吃，而且少得可怜。

老板和账房先生两个人一顿中饭菜就要吃掉一百二十个铜板，可是，阿根一个月的月规钱只有五十五个铜板。这五十五个铜板，扣了菜金，余下的还够什么用呢？当时剃一个头就要六十个铜板，洗个澡就要三十个铜板。因此阿根没办法，只好带三、四个铜板去找剃头摊的小学徒剃，那些八、九岁的小孩子，连剃头刀都拿不稳，一个头剃下来，满头满脸鲜血淋淋。洗澡更不用说了，阿根疲劳了一天，身上铁锅底似的，油污一身钻进“鸽子笼”就算了。只有逢年过节，他才到浴室去，等浴室打烊放水时，花上十五、六个铜板，跳进那满是泡沫的浴池泡一泡，连肥皂也来不及擦，水就放光了。

阿根心里恨，他恨老板象“鸽子笼”里的臭虫，拚命地吮吸他身上的血。阿根只好忍着耐着，他总是希望，苦干苦熬，尽快学上一身手艺，只要熬过这三年就能出头。

阿根多么渴望早点学到技术。可是老板怕弄坏机器，不准他靠近车床。就这样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地过去了，划在床头上的用来计算日子的黑杠杠越来越多，阿根心里也越来越急。急的是阿爸、阿妈、妹妹还等着寄钱回去，还有那一笔“押钱”还背在身上。阿根要请师兄教他学技术，可是老板死盯着，阿根不愿意连累他们。因此没办法，阿根只好做有心人，在替师兄们当下手时，他留心看着，默默地想着记着。有一次，一个师兄上厕所去，阿根把车床上的螺丝搭牙数了一遍，等师兄回来时，他说：“好师兄，让我车一根吧。”师兄知道他的心情，就答应了。结果那根螺丝居然车得跟师兄车出来的一样。

师兄称赞他聪明好学，打心眼里喜欢他。师兄们了解了阿根的心思，就对他说：“不要紧，你跟我们学，不让老板知道，你做车床的时候，我们锉毛头，帮你望风。”阿根听了高兴极了，他衷心地感激师兄们的关怀。

在师兄们的帮助下，阿根开始学到了一点技术。他心灵手巧钻劲足，上车床时汗水流下来都顾不得擦一擦。就这样，阿根很快学会了车床操作的基本技术。可是过了不久，灾祸就来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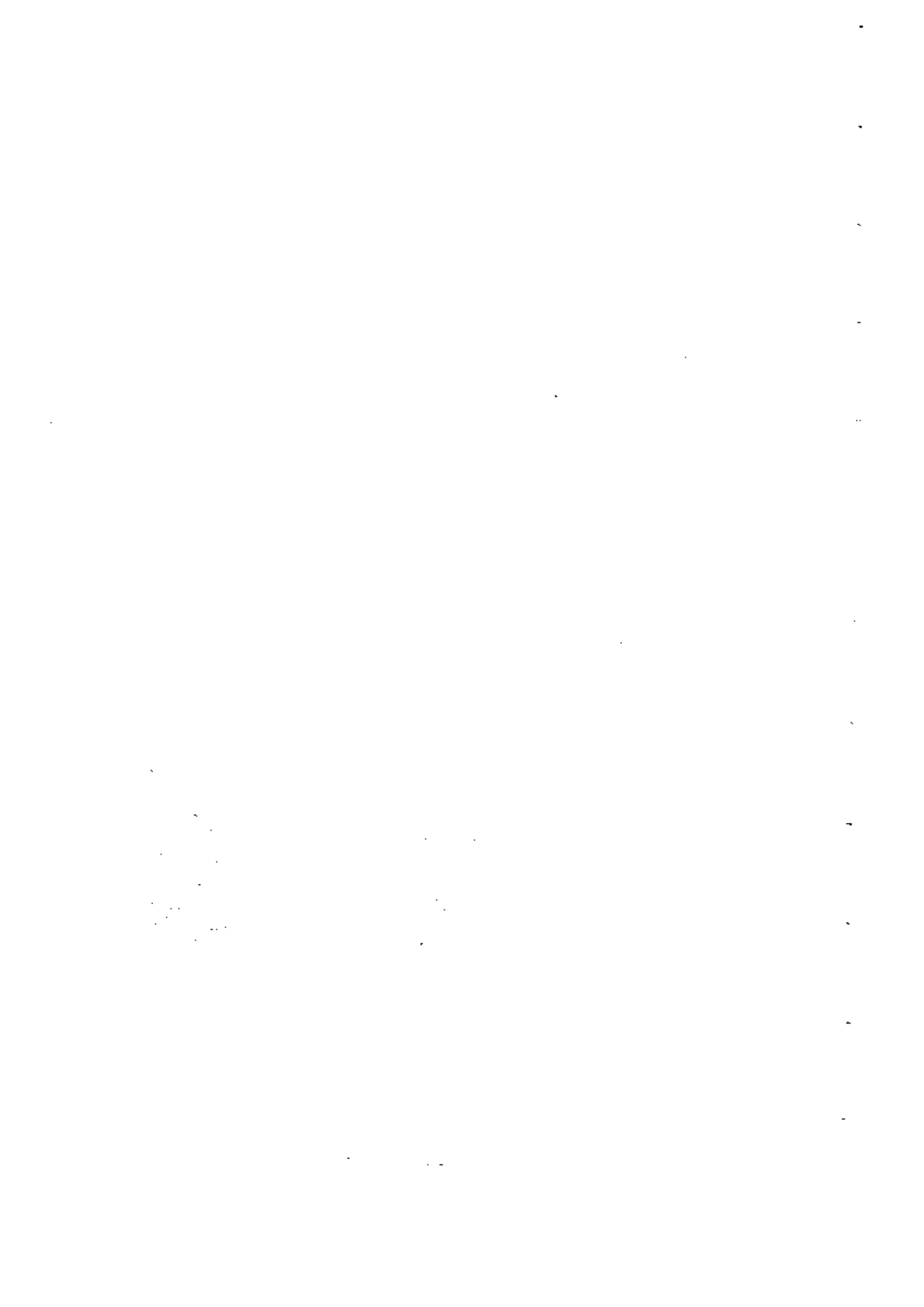
有一天，阿根独自在车床前学车一种新螺丝。万万没有想到，平时很少在这时候露面的老板突然窜了进来。这个恶煞鬼走到阿根身后，猛一声吼叫：“小赤佬，你把我的螺丝车坏了！”阿根转身一看，连忙闪到车床边去，想伸出手去关车，不巧手碰上了飞转的螺丝……

“哎哎呀！我的车床！”老板气急败坏地把车床关掉了。接着在车床旁边转来转去，心痛地检查起车床来了。一看车床没碰坏，他的淫威才没有发作。再一看螺丝夹具上一滩血，这才回过头来瞪了阿根一眼，骂了一句：“贼骨头，偷学车床还要装模作样！”

十指痛，痛连心，阿根脸色煞白，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的左手中指被轧断了，血肉模糊，一节断指连着皮肉，鲜血不住地流出来。老板死活不顾，拉起阿根，拖到账房间，拿起一把剪刀，“喀嚓”一声把阿根被轧坏的手指剪掉了，又顺手抓一把香灰抹在断指上，就算完事了。临走老板还气虎虎地对阿根说：“回工场管工具去！”几个师兄看阿根痛得满头冒虚汗，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去跟老板交涉，要求让阿根休息一天。

老板拍掉手上的香灰，瞪了师兄一眼，说：“左手坏了，右





手又没坏,有啥影响?屁大点伤也要休息,都这样的话,让我开厂的喝西北风去不成!”

不给药医,又不让休息,阿根的手怎么会好呢?过不了几天,手指肿得象胡萝卜,外面裹着的石棉条把血肉粘成了冰硬的一块,阵阵疼痛钻心,有时在睡梦中都会被痛醒。可就是这样,老板也不放过他啊!

一个雨天的下午,一个师兄从阿根这儿借去了一把破旧的扳手,把螺丝攻扭断了。老板拿起铁条打完了师兄还没停手,就找到阿根头上来了。他把铁扳手朝阿根头上扔去,阿根连忙用右手去挡,那铁扳手正好砸在阿根的左手上,那断指的硬块被碰掉下来,他昏倒过去了。

师兄们闻声赶来,看见昏死过去的阿根,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一张张怒不可遏的面孔对着老板。老板第一次看到“鸿翔泰”的学徒们这样一副架势,便色厉内荏地说:“你们要干什么?”“把阿根送医院去!”“送医院?”老板心里想:这一百几十个学徒,谁有这个福份?要我出一个铜板不是生意!“把阿根送医院去!”学徒们又一次喊了起来,有的还捏紧着拳头呢。老板心里慌了,他想:要是这伙人起来造反,对自己倒也不利,再说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误了生产对自己也是损失。于是他只好无可奈何地掏出一块银洋,打肿脸充胖子,“当郎”一声扔在地上狼狈地溜了,临走还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钱记在账上,将来扣!”

#### 四

苦难的学徒生活,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阿根那年断指伤口愈合后,老板看出阿根急迫要学艺的心思,就调他去

做车床了。他要利用阿根的这个心思，让他早点做自己的摇钱树。

阿根的左手中指少了一截，但是为了早日摆脱挨打受骂的苦日子，他仍然十分刻苦地学技术，车钳刨铣样样能干，一天能车上百根螺丝，会磨几十种车刀，还能装一些小型泵浦，活干得又快又好。

可是，阿根的心情却越来越不平静了，他的耳边老是响着“三年为限”那句话。在他那“鸽子笼”的墙壁上，已经画满了黑道道，他想：“明天要是再添上一道，就是整整的三年了。”三年啊，在人的一生中是很短暂的，可是对于阿根来说，却是艰难熬的一千零九十五天啊！在这三年中，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阿爸和双目失明的阿妈怎样了呢？他们也一定跟阿根一样扳着手指头，盼望这日子快快来到！这天晚上阿根想得特别多。

第二天，阿根手上干着活，心里却希望老板会来对他说：“你满师了。”可是等啊等，从早上到黄昏，连老板的影子也没见到。等啊，等啊，等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两三个月，老板还是不提满师的事。阿根忍不住了，就鼓足勇气，决定找老板去。于是，他来到了三年前来过的那个阴森森的殿堂。

“你来做啥？”阿根一踏进门槛，老板便“哗啦”地一下，慌忙把台子上的一堆银元掬到了自己身边，生怕被阿根抢去似的。阿根看见老板这副样子又可笑又可鄙，他直截了当地说：“我进厂三年多了……”“三年多又怎么样？”老板使劲瞪了他一眼，摆出一副威势说。阿根疑惑地说：“关书上不是说三年……”老板嘿嘿地冷笑一声，心里想：“你想得倒美，三年，哼，我在你身上还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呢，难道就这样放了你吗？”

他想把阿根训斥一通，转念一想：“不行。”怎么个对付？老板有他的另一手，一转身从箱子里抽出一叠纸。阿根一看就知道是“关书”。只见老板从里面抽出一张，往阿根面前一伸说：“你看看！”阿根不认得“关书”上的字，可对“关书”里的话，倒能记得几句。于是，他看了老板一眼，就说：“三年为限……”老板立刻露出一副狡黠的神气接上去说：“下面还有一句呢，‘需经师父满意方可满师’，你知道我对你满意了吗？”说着，又拉长似笑非笑的胖脸对着阿根：“阿根，我也晓得你学得不错，可是不要忘记我供你吃，给你用，是我养活了 you。你还不想好好报答我！俗话说，‘学师三年，谢师三年’嘛。你看，在我这儿学七年八年的还多着呢。谁象你这样翅膀还没长硬就想飞了？”阿根听得憋红了脸说：“我……”老板又拉下脸说：“你想走吗？可以，把这三年的一切费用还给我！”接着，他又自找梯子下台阶地说：“这样吧，看在你手上的功夫，你好好替我再做一年，我也不会亏待你。就这样吧，我是不喜欢多罗苏的。”

阿根日思夜想着“三年满师”的希望成了肥皂泡，他愤恨极了！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富人们太可恶了。他知道阿爸阿妈没有这么多钱来赎自己回去，为了阿爸阿妈和妹妹，为了那笔阎王债“押钱”，为了要走出一条活路来，他决心再咬紧牙关熬一年。

阿根把“鸽子笼”墙壁上画的黑道道擦去，又从头开始画新的黑道道。每天画一根，真是度日如年啊！

但是，最后这一年没熬到头，阿根就倒下了。开始，他老感到头痛乏力，浑身发冷，但还是坚持一天干十几个钟头活。因为他知道，按老板的规矩，现在歇一天，以后得补上两天。他多么渴望能早日冲破这窒人的牢笼！哪怕能早一分钟也好。



因此，只要能撑得起来，他就决不愿意再给自己延长这罪孽的日子。可是，俗话说：“好汉只怕病来磨”。一天早晨，阿根终于撑不起来了。他只觉得天旋地转，人昏昏沉沉象躺在云雾里一样。师兄们给他喝了几口泡饭汤，立即就兜底儿地吐了出来。师兄们只好去对老板说：“阿根病倒了，不能上班了。”老板对账房先生一挥手说：“记在账上，以后照补。”

过了几天，阿根就浑身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红疙瘩，两只眼睛肿得象鸭蛋一样，只剩下一条线。老板见阿根几天不上班，叫账房先生到“鸽子笼”去看一看，只见阿根浑身红肿，奄奄一息。他忙去对老板说：“阿根完了，出了天花！”

老板一听，拍了下桌子说：“出天花会传染的，十个有十一个都要死，快把他抬出去！”

账房先生说：“人还没死，要是把他撵出去，他的叔叔知道了会有点麻烦的。”

老板眼珠一翻说：“那就通知他叔叔快来领回去，就说他已经满师了。”

账房先生把阿根的叔叔叫来了。老板对他说：“你侄儿病了，把他领回去休养休养罢。”

叔叔到“鸽子笼”一看，一下子给吓呆了。他流着眼泪对老板说：“怎么会等阿根病得这样重才让我知道？人都快没用了，叫我怎么向他爹娘交代！”

老板摇着胖脑袋说：“这就叫好人做不得了。我原想让他在我这里养养好算了，谁知道他出了天花呢！”

叔叔觉得事情已到这地步，多争也没用。最后，便向老板提出要路费。

老板听了，眉头一皱，双手一摊说：“这个我就无能为力

了。阿根半个多月前就满师，已经不是学生意了。因为他生活还拿得出，所以别人四元一月，我给他开六元一月……”

“那末就请你借三个月工钱，等阿根病好了回来再从工钱里扣还。”叔叔要求说。

老板心想：“小赤佬不过三天就要死的，以后叫我到地府里去讨这笔账？”他眼珠转了两下，说：“不瞞你说，近来生意清淡，以后阿根也不必再来了。你也知道，‘鸿翔泰’本小利薄，是从来不用老师傅的，还是让他到别处去高升吧。”

最后，老板冷笑着扔给阿根的叔叔四块银洋，说：“阿根还有半个月工钱，共是三元七角二分。多余的也不必找了，我向来不是个勒刹吊死（不爽快的意思）的人。”

阿根的叔叔气极了。他想：阿根这孩子象奴隶一样为你做了三、四年，现在病倒了，你就一脚把他踢出大门。富人的心怎么这样毒！可是上哪里去评这个理啊。法院是富人的，监狱为穷人开。于是，他只好当当卖卖地凑了十几元钱，又请了两个好朋友，把阿根抬上轮船，送回了老家。

阿根出去近四年，家里少了张嘴，可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阿根的妹妹也连饿带病地死了。阿爸阿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日夜盼望着儿子会带着钱回来。想不到盼回来的却是只剩一口气的人。阿根是阿爸阿妈的命根子，拚上这把老骨头也要把儿子救下来。实在想不出办法，阿爸只好咬着牙拖着生病的身子到镇上去打短工。

没过两天，阿爸也让人给抬回来了。受尽地主压榨的阿爸被沉重的货物压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回家后吐了几口鲜血就含恨离开了人世间。他只活了四十八岁。临终之前，他手里还紧紧捏着几个要给儿子治病的铜板！

阿爸死了，家里抽去了主心骨。这个打击对于这个苦难的家庭来说，实在太大了，就象航行在大海上的一只破船又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日子更加难熬了。饱经风霜的双目失明的阿妈，以惊人的坚韧意志经受着这些打击，在穷乡亲们的帮助下，用土方草药把儿子救下来了。她东借一把米、西要一口粥地喂养着这幸存下来的唯一亲人，终于使年青的生命又在阿根身上慢慢恢复起来。阿根不忍心苦命的阿妈再为他受这样的苦，他支撑着尚未痊愈的身子又回到了上海。

花花绿绿的上海滩，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可是，徘徊在街头的阿根却不知何处去栖身。他有着—双勤劳而多能的手，他也有着—身劳动力，却找不到一个主顾。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东打一天短工，西干两天零活。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只好不拿工钱只吃饭地给人家白白做了二三年。

那年头，穷人到处都活不下去。阿根的丈人是阿爸在世时一条苦根上的穷弟兄。抗日战争爆发后，阶级压迫加上民族压迫，劳动人民更是没法活。丈人对阿根说：“阿根啊，这年头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姑娘放在我身边总是桩心事。你就领了去—块过吧，在外面也有个商量搭帮的人。”阿根也知道丈人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自己有心照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就把妻子接了过来。从此，阿根就带着她东奔西闯地到处谋生。可是尽管他没日没夜地累断筋骨，也难以养活两张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商业更趋萧条，物价日夜飞涨，原来做一天工还能换回二三斤米，这时却—斤米也难买到了。—天，阿根和另外两个工人—起去向老板交涉，要求增加工资。可是，工资没有加到，却被老板停了生意。这时，妻子已经怀着好几个—个月的身子，他却磨破脚底板也找不到—点活干。上海

实在活不下去了，夫妇俩只好把几块铺板和几只破碗旧锅卖掉，拼拼凑凑买了两张船票，决定回家乡去投奔老丈人。

可是老丈人一家日子也不好过啊。丈人只得走东村跑西家为他们借了一百斤谷子，让阿根在乡下给人家打点零工将就着过。在乡下，要打个零工也不容易。干两天停三天的，一百斤谷子不到两个月就吃光了。到妻子分娩的那天，家里连一粒米也没有了。妻子饿着肚子，躺在铺上整整哼了一夜，孩子却产不下来。阿根含着眼泪守在妻子身边，心里象刀绞般的难受。到第二天中午，下了一阵大雨。听人家说，大雨之后，田边水沟里的泥鳅都游出来了。他只好咬咬牙，丢下躺在铺上哼哼着的产妇，去捉泥鳅。这天，总算不错，捉到了十几斤泥鳅，到镇上换了几斤米，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这时，老丈母也闻讯赶来了，还提来了几斤米。在穷乡亲们的帮助下，婴儿总算安全地产下来了。那是个可怜的小女孩，由于母亲长期的饥饿，孩子瘦得只有一只小猫那么大，声音都哭不出来。在这罪恶的世界上，她只呆了两天。由于母亲没有奶水，她就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包耀根抱着那没有生命的亲骨肉，悲愤地流着眼泪，默默地走进山沟，用黄土碎石把它掩埋起来。他呆呆地站在这小土堆前，诅咒着这个吃人的社会，这个充满着罪恶的黑暗世界。他问自己：这样的年头到什么时候结束，天下的穷人哪一天才能翻身啊！

## 五

沉沉的乌云终于驱散了，金色的太阳终于出来了！

一九四九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上海解放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漂泊四海到处谋生的包耀根，跟着过去的师兄弟们一起，回到了他曾经做过好几年临时工的“招商局船厂”——现在的上海船厂。

在工厂大门口，迎风招展的红旗，一位解放军同志紧握着包耀根的手，和蔼可亲地对他说：“欢迎你，工厂的主人！”包耀根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军代表响亮的声音继续响在他的耳旁：“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得解放，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打倒了地主买办阶级，咱们穷工人翻身做了主人哪！工人弟兄们，让咱们甩开双手，抡起大镢头干吧！”

拿枪的大手和握镢头的大手紧握在一起。包耀根有满肚子的话要对亲人解放军说啊，他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亲人解放军啊！包耀根把自己的一双手伸到了亲人面前，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就从这一双手说起吧，它为资本家干了多少年，手掌上的老茧磨去一层又一层，甚至还丢掉了一个手指。可是，得到的却是饥饿、失业和贫困。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怎能不使他激动得热泪直滴呢！包耀根心里感激啊，他感激亿万受苦人的救命恩人毛主席！

从此以后，包耀根这双在旧社会受过千辛万苦的手，和那一副灵巧的手艺，第一次贡献给了自己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他暗暗下决心：党指向哪里，我包耀根就坚决奔向哪里。

当年十月，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逃到最后几个岛屿上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

包耀根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踊跃报名支援前线去。他和厂里几百个工人一道来到了解放舟山的前线，造机帆船、修舰艇，帮助解放军出海作战。

在沙滩上修船造船，环境很艰苦，敌机每天要来轰炸上百次。但包耀根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了解放千百万还在受苦的阶级弟兄，他不怕苦，不怕累，浑身迸发着无穷的干劲，和同志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坚持战斗。他甩开两手，一榔头一榔头地敲打着，每一榔头都象敲在万恶的蒋匪帮头上。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就造好、修好千万艘战舰快艇飞驰在东海海面上，让阶级兄弟们早日脱离苦海，获得解放！

在敌人野蛮的空袭中，包耀根的好班长姚宝根同志为了保护机器，保护阶级姐妹，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看着战友的鲜血在自己身边流淌，包耀根胸中燃起了愤怒的烈焰……就在这一天，一艘登陆艇要修尾轴管、装车叶。上级要求在一个夜晚把它抢修出来。包耀根和其他三位工人把任务抢过来，立刻干开了。他们从落潮开始战斗，一直干到涨潮，还剩下车叶没有装好。在这关键的时刻退下来吗？在包耀根面前顿时出现了姚宝根的高大形象，他对三位工人说：“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向宝根兄弟学习，哪怕海水淹没我们，不修好登陆艇，决不下火线！”“对！”战友们异口同声地说。就这样，他们在齐胸深的冰冷彻骨的海水里继续战斗，直至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等登陆艇修好，包耀根被冻昏过去了。

在支前战斗中，包耀根表现了一个翻身工人的坚强性格，为人民立下了功劳，上级领导给他记了三等功，并送他到南京政治学校去学习。

在南京，包耀根学了文化，懂得了革命道理。他读着《社会发展史》，沉痛地回想自己和一家的遭遇，他明白了自己半生受苦的根源，是由于万恶的剥削制度造成的，沉重的三座大山，压得他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同样是这一双手，在旧社会

东奔西跑拚命地干，却无法养活两张嘴。现在党和毛主席让自己住进了宽敞的新村楼房，还把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也接来了，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生活是多么安定啊！包耀根想到这里，越发激起了他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努力争取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生。

从南京回来后，包耀根更加刻苦地学习，认真地工作，他每做一项工作，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因此，连年被评为生产能手，劳动模范，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包耀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庄严而又幸福的时刻：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他在党旗下紧握着拳头庄严地宣誓：“是党给了我这个旧社会的奴隶以第二生命，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献给党的伟大事业。”

## 六

一九五八年，党和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上海船厂沸腾起来了，人们大闹技术革新，天天挑灯夜战，车间里，轮船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气象。

在这英雄的战斗行列中，当然少不了包耀根。他已经是一位八级老师傅了。日月的消磨使他显得老了些，可是他的革命斗志却是越来越旺盛。

抢修“建设”号轮船主机，是大跃进中的一场硬仗。在战斗中，包耀根和工人们一起连续干了三天三夜，他的双眼熬红了，两条腿肿得又红又粗，走路都感到困难，但他还是钉在机舱里。车间领导几次动员无效，最后只好发布强制命令，把他

“驱逐”出机舱，“勒令”回家。

包师傅听话地从前机舱走出去，可是他在岸上兜了一圈，又偷偷地溜回船上。

一个小青年发现包师傅又来了，他想叫出来，包耀根连忙“嘘”了一下，把头上的安全帽往下拉了拉，就蹲在汽缸旁拆起螺丝来了。

深夜，黄浦江两岸的万家灯火构成上海大跃进的美丽夜景。上海船厂的码头上，弧光闪闪，焊花簇簇，在“建设”号机舱里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包师傅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工作上了。突然，一个浪头打来，轮船一晃，包耀根右手的食指被撞三桩撞断了。在一旁的小青年发现包师傅的手上有血，一声惊呼，工人同志们一下围了过来。正在参加劳动的车间主任赶来了，工地医务人员抬着担架奔来了。车间主任和同志们抬起包师傅朝担架上按。可是，他又激动又不安，挣扎着起来，笑着说：“这点轻伤算啥，千万不要影响工作。”同志们不由他分辩，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医务室去。

党委书记也闻讯赶来了，他关切地询问包师傅的伤势，并立刻挂电话叫来汽车把他送往医院。

包耀根在医院里动了手术，没过三天，他又溜回厂里去了。医生找不见人，就只好到领导那儿去“告状”。

党委书记把包师傅叫到了办公室，包师傅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党委书记已经把一张火车票送到了他手里：“包师傅，党委决定把你送得远一些，到杭州去安心养伤吧。”“厂里的工作……”包师傅哪肯答应。“厂里事有我们大家，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休养。”党委书记用不容违拗的口气说。



包师傅捏着这张火车票，是多么激动啊，他止不住热泪盈眶。他想到解放以来，党和人民给了自己多少荣誉，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现在仅仅受了一点伤，党又要送自己到杭州去休养。他心里蕴藏着多么热情的话啊，可是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又哪里说得完呢！党啊，您给了包耀根以第二生命，而且还拯救了他的一家，解放了千千万万受苦的劳动人民。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包师傅立誓要更加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为党的事业不断革命，永远革命。

当一个人深深地铭记着过去而又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他的思想能翻起多大的波浪！正是这些，成了包师傅创造性劳动中最强大的原动力。

可不是吗，在轰轰烈烈的打造船工业翻身仗中，包师傅站在千万个才智横溢、英勇顽强的闯将的行列中。他们是时代的英雄吗？谁说不是！正是他们，满怀着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无比愤慨，狠批了“爬行主义”、“洋奴哲学”，树立了建设“海上铁路”的雄心壮志。正是他们，为了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用双手创造出了人间奇迹，实现了“造出万吨轮，远航亚非拉”的誓言！

万匹机声隆隆不断，黄浦江水滚滚向前。包耀根师傅并不满足，他觉得还要努力作战，把自己这勤劳、勇敢、智慧的双手连同自己的一切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人民的革命事业，要用它来攀登新的高峰！

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 整理  
上海船厂工代会

# 血 泪 浦 江 潮

——上海港第七装卸区老工人黄有民讲家史

什么人似虎狼张牙舞爪？

什么人似牛马终日苦劳？

什么人设下这“过山跳”？

什么人走不完“独木桥”？

.....

这是革命样板戏《海港》中老工人马洪亮的一段唱词。《海港》这个戏，讲的是我们码头工人的事情，所以我特别爱看。每当我看到《壮志凌云》这一场，看到那阶级教育展览会里陈列的杠棒、“过山跳”，听到马洪亮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辛酸的往事一桩桩地涌上心头。我真想一步跳到台上去，拉住韩小强，告诉他：我从十一岁开始，当了四十几年的码头工人。解放前，我和你爹、你舅舅一样，也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我要告诉他：解放前，这黄浦江，流的是我们码头工人的血和泪……

## 家 破 人 亡 离 家 乡

我老家在苏北高邮，祖祖辈辈租种地主的十几亩薄地。祖父领着一家七口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洒下了自己大半辈

子的血汗。一九二五年我八岁，家乡遭了一场大旱，河水干枯，田地龟裂；随后又下了一阵暴雨，已被晒得干枯的庄稼经暴雨一泡，死了一大半。秋收时，连往年的四成都没收到。稻谷还在场上，比灾荒更凶狠的地主就逼租来了，把仅有的一点粮食一粒不留地抢了去。祖父又气又急，从此一病不起。狠心的地主还硬逼着他去耕地。他艰难地扶着犁，一步一口鲜血，耕着耕着，终于一头栽倒在犁沟里，含着深仇大恨死去。祖母扑在祖父的尸体上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她跑到地主家去评理，又被狗腿子从台阶上推下来跌伤，抬回家没几天也死了。

祖父祖母死后，地主就趁火打劫，逼着我们退佃。家乡呆不下去了，父亲忍痛把十二岁的姐姐卖了顶债。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孩子，爹养不活你，你到上海去找在码头上做工的二叔吧……”说着，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弟弟也给人家放牛去了。父亲和母亲就到南京去逃荒。我的一家就这样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了。

在旧社会，穷人逃难逃荒也不容易呀。从乡下到上海要乘船，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没有半个铜板，哪来钱买船票？只好偷偷地爬到货船的船尾，拉着木舵，在水中泡了一天一夜，到天生港，又顺着沪帮木偷偷地爬上轮船，躲在厕所里。过了好长时间，船靠上了码头，到了上海。我心惊胆颤地跳下船，可是，刚踏上码头，一个胖得象猪似的警察，晃着手中的棍子，冲着我走过来，喝道：“哪里来的？臭瘪三！”紧接着就朝我没头没脑地毒打起来。我眼前一阵昏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远处高楼上的霓虹灯一会儿绿，一会儿红，象进了妖魔世界似的，这就是花花绿绿的上

海滩。我躺在一条偏僻的马路上，全身的骨头象散了架，一阵阵针刺般的疼痛。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到哪里去找二叔呢？

后来，幸亏碰到了一位在码头上扛活的工人叔叔，他带我过了江，帮助我找到了在老白渡码头做小工的二叔。可是，二叔也是光棍一条，住在一个又暗又矮的“滚地龙”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我只好白天拎着一只破篮子去要饭、拾荒，晚上在二叔的“滚地龙”里栖身。

### 黄浦江畔的“小野鸡工”<sup>①</sup>

过了年，我已经十岁了。在二叔住的棚户区，我同一些码头工人的孩子们也混熟了。有一次，他们邀我一起到码头上去捡煤渣，说那比要饭强，就是要冒点危险。我想二叔天天披着星星出门，迎着月亮回家，还是连稀汤也喝不饱，我如果能自己管自己一张嘴，不也可以减轻些二叔的担子吗？所以也顾不得什么危险不危险，就跟着那些和我一样的穷孩子们到码头上去捡煤渣了。

到了下半夜，大人们都睡熟了。我们十几个穷孩子由一个叫“小划子”的领着头，一溜烟似的来到了“大坂栈”（即现在的上港七区）门口。只见码头上静悄悄的，铁栅栏大门紧闭着，旁边的亭子里有两个门警正在打瞌睡。“小划子”先蹑到门口，故意轻轻撞了两下铁栅栏门，让它发出一点声音，见那两个门警还是睡得死猪似的，便向我们一挥手，我们十几个孩子便一个个蹑手蹑脚地从铁栅栏门底下钻了进去。“小划子”

---

<sup>①</sup> 旧社会称没有固定工作的码头工人为“野鸡工”。这种工人整天为工作奔波，行止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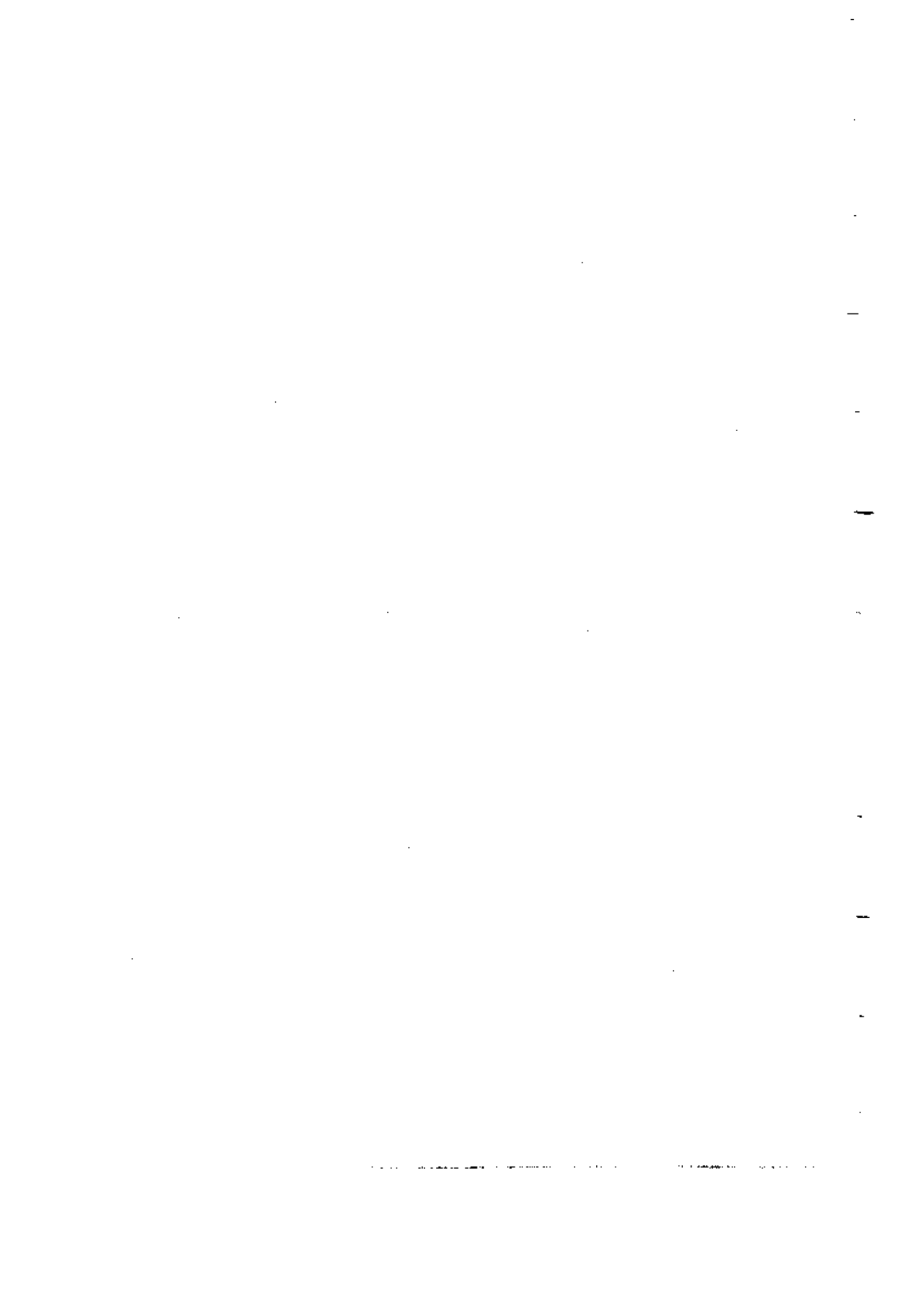
领着我们“捉迷藏”似的在码头上摸来摸去，终于摸到一艘黑压压的大轮船旁。在靠近船尾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堆还在冒着热气的煤渣。于是，我们就借着船上的灯光开始捡起来。煤渣是刚从轮船上倒下来的，还有些烫手，可是谁也顾不得这些，用手拚命地扒着、捡着。我一面捡着煤渣，一面提心吊胆地不时向四周张望。因为资本家、工头们是不准穷孩子们进码头捡煤渣的，要是被他们看到，不是抓到警察局去打个半死，就是放出凶恶的狼狗来咬。听小伙伴们说，以前有两个捡煤渣的穷孩子被资本家放出来的恶狗活活咬死过。但是为了生活，我们还是要拚着命去闯。

快天亮时，我们每个人的篮子差不多都装满了，“小划子”轻轻吹了声口哨，大家赶紧提起篮子往外溜。这一天我捡到的煤渣，拿到大饼摊上竟换到了七只大饼。我心里高兴地想：这下也可叫二叔松口气了。从此，我每天白天在家睡觉，半夜就和穷孩子们一起去捡煤渣。

又是一个深夜，我们十几个穷孩子象往常一样，借着昏黄的灯光偷偷摸进了码头。刚来到一堆煤渣旁边，忽然听到背后传来“抓小偷！”的喊声，随着喊声，一条比我人还高的狼狗向我们扑了过来。小伙伴们“轰”的一下四散奔逃了。我拚命地跑着，冷不防被一个什么东西绊倒了。等我从地上爬起来时，那条恶狗已死死地咬住了我的脚。我痛得眼泪直流，拚命地挣扎着。就在这时，后面又窜来一条大狼狗。我想，今天反正活不成了，就一头翻进了滔滔的黄浦江。

等我醒来时，却发觉自己躺在一条小舢舨上。原来是一位摇舢舨的叔叔把我从江里救起来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去码头上捡煤渣了。





在旧社会，穷人到处都活不下去。我十一岁那年，父亲、母亲和弟弟在南京实在没法过，也来到了上海。在二叔的“滚地龙”旁边，用拾来的破竹片烂稻草又搭起了一个“滚地龙”，就这样安下了我们一家。

父亲原以为到上海总能找到一线生路。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让残酷的现实打得粉碎了。最后，他也只好每天天不亮就从这个码头到那个码头为一张工票而奔波，在黄浦江畔做一名生活毫无保障的“野鸡工”。

“大坂栈”码头是个装卸杂货的码头。货包大至五、六百斤，小到三、四十斤。码头资本家为了捞取最大利润，用了一大批童工，专扛小件货物。童工干一天活，得到的工资还不到大人的四分之一。但是在生活的逼迫下，许多码头工人仍然不得不把自己十多岁的孩子送到码头上去扛活。我十一岁这年，也开始上码头当了“小野鸡工”。

上码头那天，父亲天不亮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懵懵懂懂地揉着眼睛说：“才半夜，出去做什么？”说完又一头倒在铺上。父亲着急地把我拖起来，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说：“已经三点了，去迟了人家工票发光了，你今天吃什么？”

我一听要挨饿，一骨碌就起来了。饭没吃一口，水没喝一杯，我就跟在父亲后面，迎着寒风，踩着晨霜奔向“大坂栈”码头。一阵阵北风吹来，冷得我浑身直打哆嗦。

我们赶到码头门口，看见一大群工人早就等在那里了。他们一个个穿着补丁加补丁的破衣衫，肩上披着块破麻袋片，头上戴着开了口的破草帽，赤着脚，腰里拴着一双草鞋（这是备着扛活时穿的）。真是：头戴开花帽，身穿“八卦”衣，脚踏“金丝鞋”！从大人的交谈中，我才知道有些人为了能拿到一张工



票，竟在这里等候了大半夜了。

这一天我们的运气总算还好。约摸五点钟光景，我被一个穿着一件又长又大的黑棉袄的工头叫到一座仓库楼下，跟几十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男孩子站在一起。另一个歪戴“铜盆帽”的工头向我们训了一通话以后，就要我们开始扛活了。

我们扛的包子，有芭蕉扇和面粉包两种。背一百捆芭蕉扇可以得二十个铜板。一捆芭蕉扇是三十六斤重，有我人那样高。我人虽然长得不算矮小，但毕竟只有十一岁，一捆芭蕉扇压在背上，压得我眼发花，腿直抖，腰挺也挺不起，实在感到吃不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如果让包子从背上翻下来，工头立刻就会收去我的工票，把我赶出码头。而这一天，我就得挨饿。因此我只好死命地硬撑着。我屏着气，牙齿深深地咬进嘴唇，艰难地移动着步子，身子就象黄浦江上的小舢舨似的左右摇晃，只要我一松气，随时都会连人带包摔倒在地上。可是我不能倒下，我还得背着包子，上跳板，爬楼梯。就这样扛啊，扛啊，扛了一包又一包，累得我浑身汗水湿透衣衫，眼前金星乱跳。不久，我背上的皮就被磨破了，汗水一浸，就象在伤口里撒了盐似的，痛得我脸上的泪水汗水簌簌往下滚。后来，我一看到包子就想哭出来。我多想休息一会儿！可是不行，包工头象鬼魂似的紧盯在后面催：“快，快，别死样怪气！”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实在吃不消了。从清晨起，我的肚子还没进过一粒米、一口水，饿得前后快要贴起来了。但不扛完活，拿不到钱，哪来吃的呀？我背着一捆芭蕉扇，踏上仓库二楼的最后一层楼梯，眼前一黑，脚一软，连人带包一齐摔倒在地上了。我正挣扎着站起来，包工头的木棍已经落在我头上：“小赤佬，你想不想干？不想干给我早点滚出去！”

我知道，我这时离开码头，那这一上午的活就算白扛了。因此只好忍着痛，止住泪，硬撑起身来，准备把倒在地上的芭蕉扇扶起来继续背到堆桩的地方。不料头上立即又挨了一木棍：“‘小野鸡’，你哪里来的？码头上的规矩懂不懂？快滚下去重背！”原来，按那时码头上的“规矩”，扛一包货如不一口气扛到堆桩的地方是拿不到一根筹子的。如果你半路上歇一下脚，这一趟就算白扛。如果把包子摔在地上弄脏了或摔散了，还要赔。我气愤地用力推倒芭蕉扇就走下楼梯。

中午吃饭时，工人们都跑到大门口的小摊子上，凭扛活的筹子赊几只大饼吃。因为我筹子少，只好赊二只大饼，三口两口就下了肚。看到有些大人到黄浦江边去喝水，我也跑过去捧上几口浑浊的江水喝起来。包工头象勾魂似地催着：“妈的，快点，快点！”一顿饭还不到十分钟就算吃过了。

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整整干了十三、四个小时，我背上的皮全都磨破了，衣衫贴在上面，用力一撕，血直往外流。码头上的第一天牛马生活，使我第一次看到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怎样艰难的人生道路啊！回到家里，母亲见我被打得那个样子，一面给我擦着血，一面心疼地流着眼泪。我也一头扑到母亲的怀里，再也忍不住地放声痛哭起来。

可是，为了生计，我还得这样天天去当“小野鸡工”。

### 挨不完的工头皮鞭

蝎子尾巴马蜂针，毒不过包工头的心。

在码头上当“野鸡工”，就得每天天不亮上码头去等工票。在黄浦江两岸大小一百多个码头上到处“飞”，领到了工票，才

能勉强地过一天；领不到，就只好挨饿。但就是领到了工票，这一天也不是容易挨过来的。

包工头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耍尽花招，千方百计地借故克扣工人的工资。有一次，我在十六铺码头扛杂货，一早拿到了一张白的工票，满以为这一天的生活总算有了着落。干了两三个小时，包工头就跑来把我们手里的白色工票收了去，换发了一张蓝色的；又过了一会儿，包工头又来把我们的蓝色工票收了去，给我们换发了一张黄色的。这一上午，竟一连换了三次工票。我知道，这些狗东西是在变着法儿找克扣我们工人工资的借口。如果在换工票时你恰巧不在，新的工票换不到，旧的工票就作废，这一天的活就算白干了。因此，我这天就特别地小心。

下午四点多钟，刚换过新工票，我忙抽空去小便。心想：新工票刚换过，不会马上再换。谁知道回来一看，包工头手里又捏着一叠新换下来的工票。我急忙赶上去向他要求调换。他却冷笑一声，说：“嘿，时间已经晚了，你回家睡觉去吧，明天请早。”说完，转身就走开了。这一天，我累死累活，就这样给他白干吗？不！我抢上几步一把拉住他说：“我是去小便的，你怎么就这样平白无故地赖我一天工钱！”没想到那狗东西冷不防打了我两记耳光，并硬说我偷懒。我气愤极了。天下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我正想狠狠地还他两拳头，不料突然扑上来几个狗腿子，不由分说把我一阵拳打脚踢地赶出了码头。

我回到家里就病倒了。父亲和弟弟天天迎着月亮出去，顶着星星回来；母亲帮人家做佣人，可是一天还弄不上两顿稀的糊口。

我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伤还没有全好。我们码头工人

是赤脚人，一天不做工就得挨饿，怎么能这样躺下去呢！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大坂栈”的包工头又到老白渡来，他站在街口摇头晃脑地喊着：“听着！明天去扛米，做一天每人另送四罐米。只发四百张票，一张不多——”我一听，咬了咬牙，瞒着母亲，硬撑着瘫软的身子，和弟弟一起去了。

二百斤重的米包一压上肩，我的眼睛就一阵阵发黑，浑身的骨头就象快要散架似的。弟弟见我脸色苍白，满头虚汗，走路摇摇晃晃的，就说：“少扛几包吧，反正每人还能拿四罐地脚米。”我实在扛不动，弟弟又一步不敢离开我，半天下来，两个人也没挣到几根筹子。

挨到下午，我感到实在难以支持了。但是不做到天黑，又拿不到工钱。因此，我只好死命地支撑着。我扛着米包走着走着，突然眼前一片漆黑，连人带包子一起摔倒在地。弟弟在后面“啊哟”一声，忙撂下肩上的包子来扶我。这时，一个包工头奔了过来，一看地上的米包直跺脚：“哎呀呀，包子散了！”举起皮鞭就朝我打来。弟弟连忙用身子挡着我。那包工头硬要我们赔一包米。我气愤极了，站起来要跟他评理。这时，挂在腰间的一串筹子掉了下来。我要去拾，被那小子一脚踩住。他弯下腰拾起筹子一看，晃了晃说：“他妈的，扛到现在就这几根？你是来骗四罐米的是不是？”说着，举起鞭子又要抽打。弟弟连忙说：“他病着，做不动……”

“做不动？！做不动想来骗四罐米的吗？哼，想得倒不错！”那家伙把筹子往口袋里一塞，转身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豁嘴红脸的日本鬼子提着指挥刀走来了。后面跟着一条狼狗，还有那包工头和十几个狗腿子。说要检查每个人身上的筹子。结果把十三个扛得少的工人叫到

一块。我和弟弟也在里面。一个个都被打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后来，他们把我留下，其余十二个人又被一条小汽艇送到对岸的日本兵营去了。

剩下我一个人，日本鬼子就放出一条大黑狗来咬。我被咬得浑身是血，衣裳都撕烂了。日本鬼子和包工头却在一旁狞笑。直到我被咬得死去活来，才被扔在荒地上。

下午三点多，我回到家里就昏倒了。母亲吓坏了，她疼我，又怨我不该带病上码头。

直到深夜，弟弟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这一夜，全家都没有睡。

### 躲不掉的杀身灾难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国的大片国土。我们劳动人民在阶级压迫下又加上了民族压迫。那时做一个码头工人，不仅生活没有保障，连生命也难保，常常是早上出了门，就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

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早上起得晚了点。那时，我正在浦西公平路华胜码头做工。因为怕误了时间，脸也顾不得抹一把就急急匆匆地出了门。赶到渡口，正好有一只划子就要开了，我就撒腿奔了上去。我一只脚刚跨上舢舨，突然听到背后一声吆喝：“不要跑——回来！”

我回头一看，是个伪警察。他腰里挂着手枪，神气活现地冲着我问：“你跑什么？‘良民证’拿出来看看！”

我一摸口袋，才发觉出门时忘记带了。我忙对他解释说：“因为出门很急，忘记带了。”

“哼，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那伪警察瞪着眼珠说。

我心里想：“你才不是个好东西。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可是为了免得耽误我一天的工作，只得敷衍着说：“我下回带着就是了。”

“嘿，你说得倒轻巧！”那家伙奸笑着说，“跟我局里走一趟！”

我再三对他说我是在码头上做工的工人，还把我家的详细地址、有哪些邻居等等都告诉了他。但他还是不理我。我一看舢舨已经开走，这一天的工作肯定完了。心里不由来了火，就冲他说：“你要存心找我麻烦，我也只好陪你走一趟，有啥了不起！”

那狗汉奸一听可气红了眼睛，象头疯狗一样对我乱打乱踢。末了，又把我带到警察局去。里面走出来一个日本人，伪警察对他不知叽咕了些什么，那日本鬼子笑嘻嘻地走到我面前，冷不防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胸口，猛一个“背包”把我摔在地上，摔得我两眼金星直冒，口中流出了鲜血。他们硬说我是“坏人”，想在码头上搞破坏。我一口咬定自己是工人。他们把我反绑着手吊起来打，整整折磨了我一天。傍晚，他们又把我拉到陆家嘴一块荒地上，我见那里挖着好几个土坑，才知道他们要下毒手活埋我了。

对于死，我并不怕。我只是想到，做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连走路自由也没有，竟还要平白无故地送掉性命。还有我那勤劳忠厚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明天将会含着眼泪到处去找我，却不知道他的儿子究竟为什么死去……。想到这里，忍不住要落下眼泪。但一看到眼前这些狗东西，我又忍住了。我真想扑上去咬他们两口肉！但是，我还得想个办法

让人带个信回去，否则父亲和母亲会一直盼着他的儿子。

就在这时，迎面来了五、六个熟悉的工人。他们见我被绑着，知道出了事情，就跑过来想打听一下情况。我忙对他们说：“因为我出门忘了带‘良民证’，他们一定说我是坏人，要活埋我。”

他们几个人一听，都一致证明我是在码头上做工的。并一个个拿出“良民证”来，愿以生命担保我不是“坏人”。可是那些家伙还是不肯放我。这时，下班回家的码头工人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从小就在各个码头上跑，他们大都认识我，一下子围了上百个人，他们一个个都愿意为我担保。这时，天已经黑下来，日本人和两个汉奸见人愈聚愈多，怕发生意外，最后只好把我放了。

从此以后，我出门总是格外小心。但是，在那恶魔当道的黑暗社会里，我们劳动人民再小心也躲不掉飞来的横祸啊！

一九三九年，日本鬼子在老白渡一带连抓了几次伏。我们工人谁愿意给日本鬼子去卖命！为了逃伏，我还在坟山堆里睡过两天两夜呢。日本鬼子见抓不到伏，就想了一条毒计。

一天，天还没亮，“大坂栈”码头门外已经站着好几百个等工票的工人。这一天工票发得特别多。发完工票，包工头把我们都叫到一个大仓库里，等人都到齐了，仓库门“咔嚓”一声锁上了。

过了几个小时，仓库门才打开。我们一看，门外停着几辆大卡车，十几个日本鬼子端着刺刀站在两旁。一个翻译对大家说：“快上车，一天吃三顿米饭，还有钱拿。”工人们都站着不动。那翻译喊了几遍，不禁来火了，嘴里骂了一声，便和一个鬼子叽咕了一阵什么。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嘴里“呀、呀”地嚷

着扑来，逼我们上了车。

几辆卡车挤得满满的，引擎一响，卡车就一阵风似的朝蕴藻浜方向开去。蕴藻浜紧靠吴淞口，是日本人的一个军用码头。我心想，这一去真是凶多吉少了。

到了蕴藻浜码头，我们又被关进一座大仓库。一直到晚上才开了门。他们给每个人发两块六谷粉做的饼和一碗发霉变质的粥，吃完就逼我们到另一个仓库里去扛麻包。那麻包是用两个麻袋缝起来的，有一个人那样长，里面软乎乎的，不知装的什么。我们便一个接一个地扛起来。一个工人在上肩时一用劲把麻包撕开了一条缝，突然发现里面戳出来两只人的脚，就情不自禁地叫了声：“死人！”当场，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过来，刺进他的胸膛。接着就被另外两个日本鬼子拖着扔进了黄浦江。我们都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样我们才知道，这些尸首是战死的日本兵，要运回日本去。

白天，我们被关在仓库里；夜里，被放出来扛死人。干活时稍一出声，就被刺死。只有几天时间，就死去十几个工人。有的在扔进黄浦江时还挣扎着，喊叫着。凄惨的叫声撕裂着我的心。

这时，我脑海里掠过一个念头：逃！逃出这个虎狼窝！

码头三面围着电网，一面是黄浦江。我趁一个日本兵跑开的机会，溜到河滩上，正要下水，鬼子又走了回来，我赶紧屏住气，闭上眼，装作死人。

滩头上扔满了工人的尸首。一股股扑鼻的血腥味直钻脑门。时间过得真慢呀，码头上不时地传来惨叫声，有好几次尸首差点甩在我的头上。一直等到深夜三点多钟涨潮的时候，尸首开始往外漂了，我用一具尸体做掩护游了出去。在水里泡



了两个多小时，才上了江滩。接着又穿过乱坟堆，摸了几十里路，带着一身血污，跌跌撞撞地朝家里走去。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离家六天了。回到家里，我悲愤交加，一句话也说不出。父亲望着我，呆了好长时间，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你……你还活着回来啦！”

## “血泪汇成浦江潮”

黄浦江畔做牛马，血泪往江里流，尸体在江里浮，旧社会的黄浦江啊，是我们码头工人的“万人坑”！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父亲想这下可松口气了，就给我成了亲。旧社会，穷人家成亲也是过难关。当了两天“新郎”，为了开锅，为了还债，我又赤着脚，披上搭肩布上码头去了。

到了码头上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只见那个日本人跟前的红人，姓秦的大包工头，左手撑着一根手杖，右手在胸前摆弄着一根金表链，嘴上叼着一根雪茄烟，神气活现地站在大门口。我捣了捣身边的一个工人，低声问：“这家伙还这样神气？”“这回成了什么‘接收大员’啦，见鬼！”我身旁的另一个工人忿忿地回答说。那个狗腿子照样站在一条高凳上，拿着一叠工票张牙舞爪地吆喝着：“排好！排好！”我抬头望了望天，黑沉沉的没有一颗星星。江面上停泊着几条黑鱼似的美国军舰，上面隐约传来爵士音乐和狂笑声。我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呸！去了一群虎，来了一群狼！”

这一天，我和几十个工人登上停在江心的一条长江轮卸面粉包子。一上班，包工头就大声关照：“听着！为了赶船期，大

家卸完了才能回家！”望着舱内装得满满的面粉包，我知道，这下又该拚命了。

船停在江心，人不得上岸，包工头赊给我们每天三顿饭，吃完了就干。实在累了，我们就偷偷地到船舱角落里去歇一会儿。工人们在包工头的逼迫下，没日没夜地干着。第五天的下半夜，天下起毛毛雨来，我们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被寒冷的江风一吹，冷得两排牙齿直打架。更使人难忍的是极度的困倦和疲劳。工人们一个个都是昏昏糊糊、跌跌撞撞、机械地干着活。有的干着干着，就倒在地上昏睡过去了。有的搬着货包，懵头懵脑地不知向什么地方走去，结果不是扭伤了腰，就是跌断了腿。事故接连发生。可是包工头还一再催逼着：“快干！快干！”舱面上两个开起货机的工人，手里拉着起货机的操纵杆，人却在摇摇晃晃地打着瞌睡。蒸气机隆隆地吼叫着，把面粉包吊出舱口，眼看快升到杆顶了，再不关蒸气闸，就会有钢丝绳被绞断、面粉包落舱砸死人的危险。幸好被旁边的工人发现，赶紧抢上前去，关上蒸气闸。一个开关手惊醒过来了，扭头往旁边一看，只见另一个开关手倒在甲板上，以为他睡着了，忙过去给他关上蒸气闸，再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那个工人躺在一滩殷红的血泊里，一颗血肉模糊的头却滚落在两步以外的甲板上。他大叫起来：“快来人哪！不得了，头给钢丝绳绞掉了！”舱里的工人一听都扔下活，奔了上来。原来那工人困极了，手拉着操纵杆，人却倒在旁边睡着了，结果头被卷进了钢丝绳。这时，全船的工人，都拥了过来，船上的工作顿时停了下来。“开工！开工！谁叫你们停下来的？”包工头一听停了起货机，手挥藤条从大菜间里窜了出来。“人都轧死了，还开工！”工人们气愤地回答说。“他妈的！死个人算啥？

误了船期你们担当得起？”“什么船期不船期，人都为你们做死了，不把事情料理清楚，就是不开工！”大家一面叫人去找死者的家属，一面同包工头评理。那小子一听工人要他出安葬费，圆睁着怪眼叫了起来：“活的我都管不了，还管死的！”这时，甲板上传来呼天抢地的哭声，我们几个工人一见死者家属，都为她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那包工头见死者的家属来了，却猛地一拍桌子，故意大声叫骂起来：“还不是做工打瞌睡，自己找的死？他妈的，耽搁了船期，我还没有找他算账呢！”包工头这几句话，一下子把大家激怒了。一个小伙子愤怒万分地用拳头锤着桌子说：“算账，我们就是要同你算账！人，是被你们强逼着干了五天五夜出事故死的，你们必须负人命责任！”大家都跟着说：“对，你们必须付安葬费！不然，我们就是不开工！”小伙子又说：“不付安葬费，谁也别想在这条船上开工！”大家又一齐怒吼：“对，谁也不准开工！”

那小子见这势头，象漏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瘪掉了。他连忙换上一副笑脸说：“大家有话好好说嘛，码头上天天见面，何必呢！只要大家不误船期，钱嘛，总是可以商量的……”经过一番斗争，总算把死者安葬了。

回家的路上，天还没亮。那血肉模糊的人头，那撕裂人心的哭声，老是萦绕在我的心头。我觉得头昏沉沉的，胸口闷得慌，望着雾中显得更加昏暗的路灯，心想，这天什么时候才会亮呢？

码头上的活常常是白天黑夜连着干。包工头、狗腿子一个个象红了眼的恶狗，变得格外凶残。加上劳动条件的恶劣，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伤亡事故一桩接着一桩，有时一天都要出好几桩。

一次我在杨家渡码头扛棉花包子。天刚下过雨，码头上一片泥泞，跳板上沾满了烂泥，象抹了层牛油似的。工人们扛着几百斤重的棉花包，脚踩在跳板上一步一滑，真是险哪！我们一个个屏住气，小心翼翼地迈着艰难的步伐。脚下是激流汹涌的黄浦江，掉下去就是一条命呀！

半夜里，江水猛涨，搭在船帮上的跳板陡得象梯子似的。这时，我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了，加上肚子又饿，扛着棉花包走上跳板，两条腿直打颤。我真想扔下包子不干了，可是那些如狼似虎的包工头、狗腿子，一个个手提鞭子呲牙咧嘴地站在船边，谁步子慢了，就是“啪啪”几鞭子。望着这又陡又滑的跳板，我愤愤地想，这不是存心逼我们工人往黄浦江里跳吗？

果然，就在这时候，听见“扑通”一声，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工人脚一滑，连人带棉花包一起翻到江里去了，水花溅得老高。我大吃一惊，连忙喊：“落江了！快救人，快救人哪！”我身上压着包子动弹不得，正着急，腿上冷不防挨了一鞭子，一个趔趄，差一点也摔下去。“他妈的，呆着干什么？”一个包工头在我背后恶煞神似地叫嚷着。我赶紧稳住脚步，走下跳板，回头再往江里一看，只见江水滚滚地流着，哪里还有个人影！一个包工头大声地嚷着：“快！快！快把棉花包子捞起来！”……

直到第二天天蒙蒙亮，才卸完了包子。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刚跨出码头大门，一位邻居就喊我：“大呆子，你父亲的脚被油桶砸烂了，快去看看！”我一听，急忙奔向“大坂栈”码头。只见父亲躺在码头大门口的泥地上，右脚被血和油粘糊在一起，不住地颤抖着。父亲的脸色痛得发青，豆大的汗珠布满了额头。母亲一边哭着，一边用破布替他擦着脚上的血。我抬头一看，码头的铁门紧闭着，几个巡警正在若无其事地谈笑着。

这些畜牲，把我父亲推出门外，又扣掉了他一天的工钱。我恨得指着他们大骂起来。

父亲躺在家里，整天地叹气；母亲守着他，整天地哭泣。因为没钱治，父亲的两个脚趾头终于烂掉了。等他能下地走路的时候，说什么也要回家乡去。我和弟弟、二叔送他上船时，他望了望外滩的高楼大厦，又听了听从近处一只运煤船的船舱里传出的悲愤的号子声，突然走到滩头边，搬起一块碗大的石头，咬着牙把石头使劲扔进黄浦江，对着江水狠狠地发誓：“这石头什么时候浮了起来，我再到上海来！”我难过地望着浑浊的江水，心想，黄浦江啊，你流着多少码头工人的血泪！你埋葬了多少码头工人的尸体！

## 漫漫黑夜总有尽

父亲走了以后，我妻子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又得了病，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家里的日子更难过了。我拚命地在码头上干着，总想多挣点钱，能换点吃的，使妻子的病好起来。可是，物价一天涨几倍，有时连着几天几夜地卖命，挣几个钱，只能买几斤六谷粉。大人还没吃的，哪来的奶水喂孩子呢？第二个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连哭都哭不动。大女儿两岁多了，还不会走，只是满地爬。妻子望着这一切，整天只是叹气、流泪。

过了年，我妻子的病还没好。第二个孩子也饿得只剩下一口气了。我自己象刚生过一场大病似的，浑身软乎乎的没劲。但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家人饿死呀，我只好硬撑着上码头去扛包子。

在白渡桥下边的“三菱”码头累死累活地连扛了两天两夜

的黄豆包子，才领了点工钱，买了几只大饼和几斤又黑又粗的六谷粉，用搭肩布包着，急匆匆地回家来。

一踏进家门，我把搭肩布往床上一摊，拣起一只大饼递到妻子面前：“来！趁热吃下去。”妻子低着头，没有接。我感到奇怪，往床上一摸，孩子不见了！忙问：“孩子呢？”她这才慢慢抬起头来，两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直滚。“你出门那天晚上就……就断气了。”可怜的孩子，她生到人间，连哭都没有畅快地哭过一声呀！当我来到孩子的坟地时，不由愣住了。地里只剩一个土坑和一张撕烂了的芦席。我急忙用手扒着土坑，心想能找到孩子一根骨头也好，扒着，扒着，连个影子也没有。我拣起一片烂芦席，呆呆地望着土坑，心呀痛得直打颤。远处有几条野狗舔着舌头，我对着这昏沉沉的天，狠狠地骂道：“这鬼世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呀！”

一九四八年秋天，蒋家王朝快要垮台了。那时候，我们工人中间常常流传着一些关于解放军在东北、华北等地打胜仗的消息。这些消息，象黑暗的地牢里透进的一线光明，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黎明之前，天总是特别黑暗的。码头上一片萧条，黄浦江上冷冷清清，我们码头工人经常一连几个星期找不到一点活干，家里天天揭不开锅。

第二个孩子死后，妻子日夜伤心，加上经常挨饿，病得更重了。她整天地流泪，夜里一听到狗叫声就直喊：“孩子，孩子呀，你快来，快到妈这里来呀！”就这样，折腾了没几天，她也含恨离开了人间。

妻子死了三天，还没抬出去。阴历九月的天，仍然很热，死人放在家里，都快臭了。可是，家里除了一口破锅，几只破碗，什么都没有。大女孩又拉着我哭喊要吃的，我疯了似的在

屋子里乱转。隔壁邻居劝我，把孩子给人家领，弄些钱把死人先抬出去再说。孩子是她母亲留下的唯一亲骨肉，我舍不得呀！我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心里说：要死，我们父女俩也要死在一块！后来，还是由弄堂里二十几家邻居凑了些东西，才好歹把妻子的尸体埋了。

家里只剩下我和大女孩了，码头上又没活干，我只好天天带着女儿到郊区河浜里去摸点鱼蟹之类，换些六谷粉糊口度日。我在苦水里泡呀、熬呀，多么盼望我们工人出头的一天早点到来啊！

## 码头工人笑颜开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上海劳动人民带来了光明。昔日乌烟瘴气的码头，现在成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的重要阵地；过去的“臭苦力”，今天成了国家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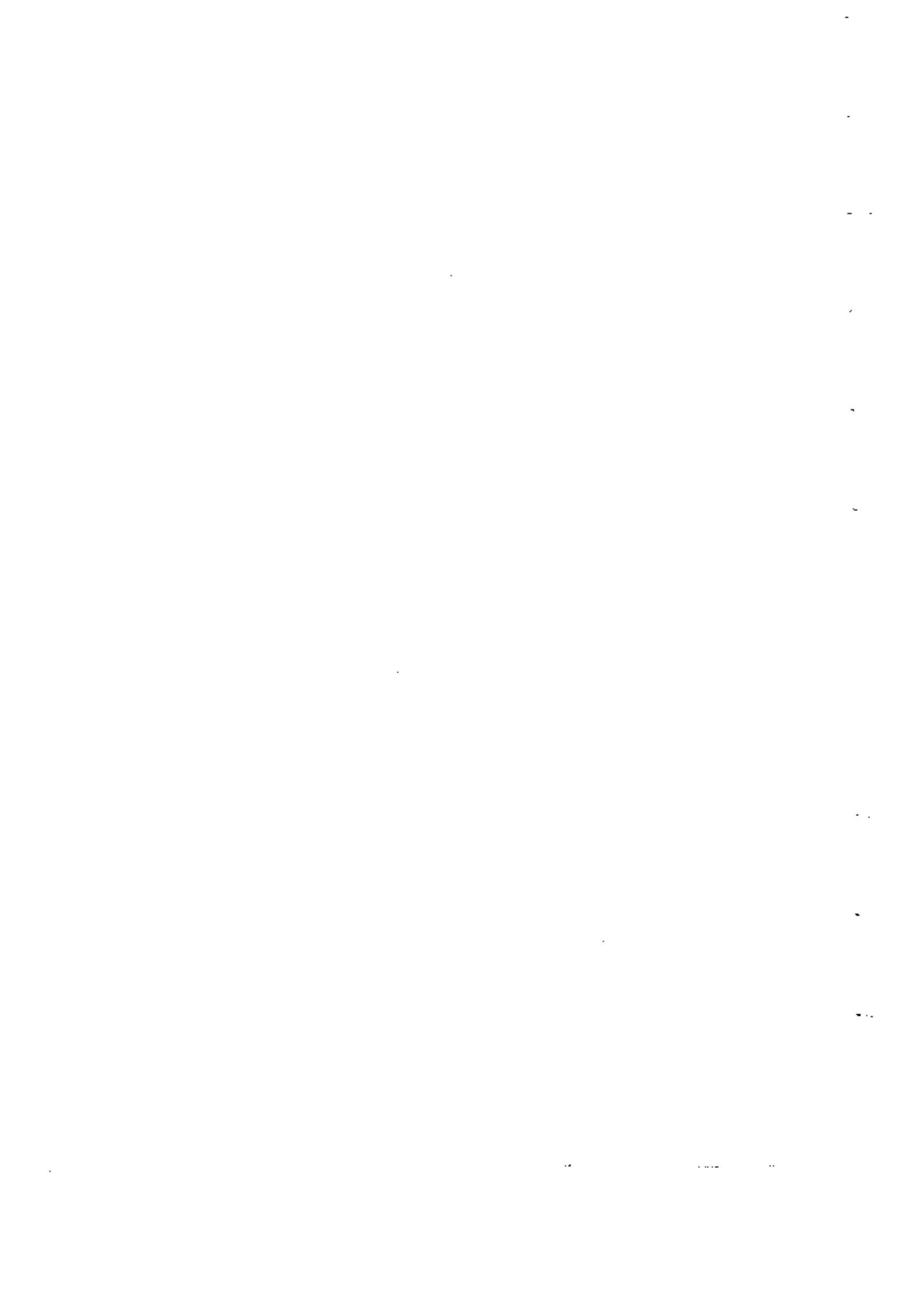
在黑暗的旧社会，真是“一座山头一只虎，一个码头一个霸”。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和大大小小的封建把头，象一群群恶狼一般扑在工人身上，吸干了多少码头工人的血，欠下了码头工人多少血债！解放后使我们码头工人高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过去被他们踩在脚下的“臭苦力”，现在一队队地背着枪，在解放军的协助下把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工头一个个地逮捕起来，并召开公审大会来审判他们。在大会上，有多少人流着悲愤的眼泪，控诉着恶霸工头的滔天罪行，诉说着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

紧接着，码头上发工作证了。这是我们码头工人的一



奴隶双手善所劫





件天大喜事。发工作证那天，我穿着一件新做的蓝布褂子来到码头上，只见大门口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好多人围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谈着什么。我刚跨进码头大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拍着我肩膀说：“老黄，过去，咱工人拿的是没有保障的工票；现在，咱们翻了身，做了码头的主人啦！”我怔怔地站着，口里喃喃地念着“码头的主人”。心里一阵热，眼前欢乐的人群，变得模糊起来。旧社会，我在码头上当了整整二十三年的“臭苦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得为一张工票而东奔西闯，挨打受骂，有时还差点送了性命！今天，我成了一名新中国的码头工人，做了码头的主人！

在一个仓库里，举行了发工作证的仪式。“黄有民！”军代表站在台上响亮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听到了，可又象没听清似的，呆呆地怔在那里。好一会儿，直到我身旁的一个工人推了推我，才猛醒过来。我迈着颤颤的步子走上台去，双手捧过那张写着“黄有民”三个字的鲜红鲜红的工作证。我久久地望着它，眼泪叭哒叭哒地滴在工作证上，我赶紧用衣袖擦了擦，把它紧紧地贴在激烈跳动着的心窝上。一霎间，那开关手血淋淋的人头，那从跳板上连人带包落江的工人的一声惨叫，那蕴藻浜码头上一具具工人兄弟的尸首，以及父亲那只压烂了的脚，一齐涌上我的脑海。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码头工人的大救星。我黄有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您干一辈子革命！”

一九五六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黄浦区人民代表。大跃进中，又被推选为工人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虽然五十几岁了，但却觉得越活越年轻了，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如果扛起二百斤的包子（当然，现在这

种劳动已经为机械化所代替了),我还能腰不弯,腿不颤地干上几个小时呢!过去人家都喊我“大呆子”,是因为我从出世长到三十来岁,脸上从来没露过一丝笑容。如今,我天天看着这繁忙的码头,看着那一艘艘自己制造的万吨巨轮,看着在金色的阳光下操纵着各种各样装卸机械的阶级兄弟,总是高兴得嘴都合不拢。

“共产党毛主席恩比天高!”马洪亮老师傅唱出了我们码头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有我们海港繁荣的今天,哪有我们码头工人幸福的今天!

上海港第七装卸区工人写作组整理

# 从放牛娃到工程师

## ——上海机床厂老工人寿奎富的家史

初春的阳光，映照上海机床厂的外宾接待室。几位来自赤道南北的非洲朋友，刚健的脸上更显得容光焕发。他们正在倾听一位四十五、六岁的老工人介绍怎样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工人工程师的经历。这位老工人叫寿奎富。

寿师傅的介绍结束了。最后，他怀着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说：“我不过是中国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寿奎富的一切！”

非洲朋友也激动地点了点头说：“你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变化。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大道上前进的步伐。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象这春天的阳光，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是的，看一看寿师傅走过的道路，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刻地了解无产阶级的过去，而且还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工人阶级的未来。

### 丧父去当放牛娃 躲债夜奔土地庙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中国。在浙江省诸暨县的同山脚下，

有一个住着好几百户人家的同山村。村头上，有几棵枝枯叶败的老杨树，在深秋的冷风中摇曳着。这是一个阴森森的早晨。天上乌云低垂，地下落叶飞舞，只有几只乌鸦停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发出“哇哇”的凄凉叫声。这时，在村后的破祠堂里，走出一个瘦骨嶙峋的穷孩子。看来他只有十二、三岁，赤着双脚，上身穿一件破单衫，下身围着破麻袋。在他后面，跟着一个近四十岁的妇女，她面容憔悴，一只手搀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另一只手搀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这就是死去不久的寿铁匠的一家。

“妈，你们进屋去吧，外面冷。”走在前头的那个大孩子看着妈妈和弟弟身上单薄的衣衫说。他就是寿铁匠的大儿子寿奎富。

妈妈和两个弟弟的眼眶里都含着晶莹的泪水，依依不舍地跟在奎富后面。今天，奎富要到本村寿财主家去当放牛娃了，往后的命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妈妈心里十分不安。

“孩子，不是妈的心狠，是地主太狠毒啦，逼债简直象催命一样！你一定要咬着牙苦熬过这两年，抵清了债就可以回家了。”妈妈抹着眼泪叮嘱奎富说。

寿家大院，是同山村上出名的老虎窝，寿财主是本地有名的“同山虎”，是个上通官府、下压百姓、有财有势的土皇帝。在村子里，他动不动就抓人下牢，有时还把人活活打死。周围一些贫苦农民谁不被寿家大院压得抬不起头、透不过气！妈妈明知这是个老虎窝，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往虎窝里送呢？因为今天如果不去，明天寿财主就要派狗腿子来抓人，而且全家都会被毒打的。想到这里，奎富咬了咬牙说：

“妈，你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话，抵清这笔棺材债，为咱

穷人争一口气。”

这时，大弟弟过来一把拉住哥哥的手说：“哥哥，人家都说寿财主家养着‘老虎’，你不要去，还是让我们一道去讨饭养活妈妈吧！”说着，小弟弟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奎富摸着弟弟的头，心里象被毒蛇咬了一样疼痛。他的目光，立刻落到弟弟受伤的左腿上。爸爸死后，家里常常一连几天揭不开锅。为了不挨饿，奎富只好带着小弟弟一起出去讨饭。几天前，在外村要饭时，弟弟被地主家的恶狗咬得鲜血直流，回家后还发了两天寒热。这以后，妈妈宁可去啃树皮、挖草根，也不让他们再出去乞讨了。现在一听弟弟又说去讨饭，他忙握紧小拳头倔强地一挥说：“小弟，你以后不要出去。好好跟妈妈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我过一阵就回来看你。”

娘儿几个就这样依依不舍地边说边走，直到奎富消失在寿财主家那黑洞洞的大门里……

奎富的爸爸寿铁匠，原来是杭州城里一家打铁铺里的工人，有着一身好手艺。可是，炉火烤干了他的汗水，铁锤耗尽了他的精力，他还是无法养活这五口之家。这一年的春天，他因劳累过度而得了一场重病。打铁铺老板见从他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就把他一脚踢出店门。挥了大半辈子大锤的寿铁匠，空有一身好手艺，却落得个贫病交迫，失业回乡。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在毛病稍有好转时，他就拖着尚未痊愈的身子去给地主打短工。有一次，他在田山沟淋了一场大雨，回来就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寿铁匠一家是个上无片瓦遮顶，下无寸土之地的赤贫，甚至连权作栖身之处的草屋也没有一间，只好住在村后的祠堂里。眼看寿铁匠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下去，家里却拿不出分文来为他求医买药，一家人只好日夜守

着他流泪。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寿铁匠就含恨离开了人间。他死后还是微开双目，口唇不闭，仿佛丢不下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又似有无数怨恨要向亲人倾诉。一家的顶梁柱断塌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奎富妈悲痛得死去活来，要不是顾着这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她早就一头撞到那石柱上了。幸亏穷乡亲们伸来温暖之手，一起帮着料理丧事，劝奎富妈咬紧牙关再苦熬几年，等儿子长大了兴许日子会好起来。

在那凄风苦雨的旧社会里，奎富妈家贫如洗，身无分文，用什么去料理丧事呢？最后，她只好托乡亲们向寿财主借了一石米钱，买了口薄皮棺材把死人草草地埋了。为了抵偿这笔阎王债，奎富妈只好接受寿家大院的吃人的条件：让大儿子奎富去寿家大院当放牛娃。

奎富进了寿家大院，名为放牛娃，实际上是被当作小长工使唤的。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得牵着牛上山，扛着锄下地，一直要干到摸黑才能回来。回来时，还得带回满满一箩筐柴草。这是寿财主的规定，稍有违反，就要挨打。寿财主对他的牛更是看得比长工的命还重。每天晚上，他都要亲自对牛进行检查。只要他认为牛的肚子不够圆，就说牛没吃饱，奎富就得挨打；看到牛耷拉着脑袋，就说把牛累着了，奎富也要挨打。有一天，奎富在外面干了一天活回来，寿财主把牛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硬说没给牛吃饱，一定要罚奎富再出去挑草。奎富累了一天，肚子又饿，实在走不动了。他对寿财主这种无理挑剔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回了一句：“今天喂得比哪一天都饱，不信你自己牵出去试试，看它还要不要吃！”

寿财主见这个小长工竟敢和他顶嘴，就拿起一根木棒，向奎富没头没脑地打来。奎富被打得倒在地上，痛得满地打滚，







却死也不讨一声饶。后来，幸亏两个长工闻声过来救了他。可是寿财主还是不肯罢休。他恶狠狠地说：“今天饶你一条命，你敢不让牛吃饱，我也不让你吃饭，饿你一夜让你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下回敢再重犯就打死你！”

奎富劳累了一天，早已精疲力尽，又遭了一顿毒打，挨了一顿饥饿，所以觉得天旋地转，两个长工刚把他扶到牛棚，他就一头倒在稻草铺上了。

这时，牛棚里伸手不见五指，外面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只有飒飒寒风不时掀打着牛棚四周的草帘子发出的“啪啪”声，才使他感到这世界上还有一点生气。他想翻动一下身子，这才感觉到浑身火烧般的疼痛。外面的冷风从草帘子的缝隙里钻进来，直刺进他的骨头，他冷得浑身发抖。最后，他只好挣扎着起来，搬了些稻草，钻在牛肚子下面来取暖。

夜静静的，奎富把身子紧紧贴在老黄牛的肚子上。但是身上的棒伤阵阵发痛，使他睡不着。他想着妈妈和两个弟弟：他们在干什么呢？大概也象自己一样饿着肚子，受着寒冻！他们此刻也许正在想着自己吧？想到这里，一串热泪禁不住滚下来。一想到那个可恶的寿财主，他的牙齿又咬得“格格”作响。他真想逃出这虎狼窝，回到妈妈身边去。可是借地主的债没有抵清，就象一根无形的铁索锁着他的手脚，寿财主随时都可以把他抓回来，而且还会连累妈妈。想到这里，他又只好咬咬牙忍受下来……

奎富就这样在寿家大院里熬啊，熬啊，一直熬到第二年的除夕前一天，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横着一条心，奔出寿家大院，回到了妈妈身边。一年多的小长工——不，应该说是小奴隶的生活，把奎富折磨得皮包骨头，脸无人色。可是寿财主却说

那笔棺材债还未抵清。第二天——除夕的晚上，狠心的地主就要派一帮狗腿子到破祠堂里来抓人了。幸亏寿家大院的一个长工偷偷来报了信，奎富一家才未落入寿财主的魔掌。

“大嫂子，你们快出去避避吧！”来报信的那个长工催促着奎富妈说，“寿财主心狠手辣，这次你们要是落入他的手掌，可凶多吉少啊！”

这寒冬腊月，茫茫黑夜，叫他们这群孤儿寡妇往哪儿去避呀？奎富看着妈妈那张煞白的脸，头一昂对妈妈说：

“妈，还是让我再回去吧！”

妈忙一把抓住他的膀子说：“不能！孩子，我们娘儿几个死也要死在一块！”

那个长工叔叔也说：“小奎富，你可不能再回去！寿财主这回要对你下毒手了，你这不是往他虎口里送吗？”

最后，那位长工叔叔叫他们先到同山背后的破土地庙里去避几天再说。

长工叔叔走后，奎富跟着妈妈，搀着两个弟弟，迎着沉沉黑夜，踩着崎岖的山路，颠颠跌跌地向着同山背后急急走去……

除夕的夜晚，同山村上的有钱人家，正在灯火烛光中摆酒设宴，狂饮大嚼地吃着年夜饭，可是奎富的一家，却在断墙残垣的土地庙里以泪充饥！

尖利的北风在山顶上呼啸着，贪婪的饿狼在山沟里嗥叫着。在这荒凉残落的破庙里，奎富和弟弟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就这样度过这富人作乐、穷人啼哭的除夕之夜！

……………

在土地庙里，奎富一家只好天天以草根树皮充饥。天气

晴朗时，妈妈就带着两个弟弟到山背后的几个村子里去讨饭。他们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一天又一天。后来，杭州来的一位铁匠叔叔找到了他们。他是奎富爸爸生前的老同事、好朋友。几个月前，他才得悉寿铁匠去世的消息，因念及穷兄弟生前情谊，这次回乡路经诸暨，特意来探望一下老友的家小妻儿。铁匠叔叔见到他们孤儿寡妇的悲惨情景，也忍不住黯然掉泪。最后，他把身上的路费全部留下，便带着奎富到杭州去求生……

### 杭州城里受折磨 黄浦江畔迎解放

奎富告别了妈妈和弟弟，告别了苦难的家乡，跟着大叔一路爬山涉水来到杭州城，进了东街一家小铁工厂当学徒。

这家铁工厂总共只有十几个工人，是专门给丝绸厂修理机器的。那天晚上，他爬进二层阁楼睡觉时，悄悄地问先进厂的几个学徒：“师兄，老板凶吗？”

一个学徒脱去油污满身的破衣服，露出条条血痕的手臂，气恨地说：“你看看我身上的皮肉，就晓得老板凶不凶啦！”

奎富看到师兄身上的伤痕，想起自己在家乡遭受寿财主的毒打，就象被人当头浇了盆冷水似的。啊，原来城里的老板和乡下的地主都是一样的狠毒呀！但奎富毕竟还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还不能理解这人世间的许多不平事情。最后，他还是想着妈妈和大叔的叮嘱：“下苦功学身好手艺，往后总有个出头的日子。”可是老板并没有让他去学技术，却把他当作小佣人使用。每天，他四、五点钟就得起来生炉子，然后便跟着老板娘到小菜场去拎小菜篮，回来后拣呀，洗呀，烧呀，忙得团团转。老板娘一不称心，就“拍拍”甩他几个耳光。忙完

了烧饭洗菜，又要抱小孩，洗尿布，拖地板，一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另外，他又是一个小搬运工。丝绸厂要修理的机件，老板都叫奎富一件件地往返搬运。五、六十斤重的地轴，压得他腰都直不起。有一次，奎富实在支撑不住，就昏倒在马路上。他被过路的行人扶起后，咬紧牙关把地轴掬到厂里，时间已经晚了。只见老板双手插腰，在厂门口恶狠狠地等着他。奎富知道情况不妙，但只好硬着头皮进去。等他把地轴放下了，老板就手握铁条，气势汹汹地喝道：“小赤佬，今天你磨洋工是吗？你两条腿想偷懒，老子就打断你！”奎富还没来得及解释，老板手上的铁条已经猛抽过来。大腿上顿时皮开肉绽，殷红的鲜血，洒在车间里，染在铁条上。昔日被地主鞭子抽的旧痕未消，今天挨老板铁条打的新伤又起。老板打了一阵，还不甘心，还要叫奎富跪下来。可是奎富人小骨头硬，他宁可被打断腿，也不向老板下跪。他捏紧小拳头，嘴唇被咬出血来了，决心要和老板对抗到底！老板象狼嗥般地吼叫道：“看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铁条硬！”话未落音，铁条又残忍地抽打在奎富身上。这时，老师傅们已经愤怒地关了车床，围上来夺下老板手中的铁条，并对老板说：“奎富今天已经来回背了好几趟。就是一辆劳动车，时间拉长了也要停下来打打气，加加油吧！”老板看到老师傅们都关了车，心里才慌起来，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说：“今天看在老师傅们面上，饶你一次命，下次再偷懒，你就别想活！”

老板走后，奎富再也站立不住了，他眼前一阵发黑，就倒在车间里。老师傅和师兄们连忙把他抬到搁楼上去，帮他揩去了鲜血，包扎好伤口。奎富被痛醒过来，看到身边的老师傅，就感激地说：“谢谢师傅们，我差一点见不到妈妈和弟弟

啦！”他再也忍不住满腔悲愤，抱住师傅失声痛哭起来。老师傅叹了一口气说：“这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呀！”

第二天，老板不管奎富腿上的创伤，又逼他把修好的机件背到丝绸厂去。奎富的双腿一跷一拐的，每走一步，都痛彻心肺，可是老板还骂他是“装死”。

奎富背着机件，路过湖滨，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放在石凳上，坐下歇一会儿。此刻，正是三月天气，湖滨柳丝飞翠，碧桃吐红，然而春天并没有给劳动人民带来温暖，西子湖边的春天啊，那是富人寻欢作乐的时节。

“滚开，瘪三！”

一声刺耳的训斥，使奎富心头一跳，他抬起头，只见不远处走来一个肥头胖脑的穿着西装的人，携着一个妖形怪状的女人，正神气活现地向一个十来岁的求乞孩子挥手辱骂。奎富见此情景，仿佛一把尖刀刺向胸口！他猛地想起自己的妈妈和两个弟弟，此刻也许正在同山脚下讨饭，同样地受着富人的这种侮辱。这个精神上的伤痛，比腿上的条条血痕还要苦痛百倍！他再也不愿在这里多坐，就挣扎着站起身，背着机件离开湖滨。他抬头望了望远处的青山叠峦，心里感到一片茫然。他想，就算能够熬过这四年，那也不过是象厂里的老师傅一样，起早摸黑地给老板干活，到月底拿到的一点工钱，还是养不活一家老小。奎富真想把肩上背的机件扔进西湖，离开这个地狱似的工厂。但一想到妈妈和弟弟，他又忍下来了。

但是，就这样，奎富也没有能熬过四年。就在第二年的秋天，老板看到生意清淡，就把他一脚踢出了厂门。

在素称“天堂”的杭州城，他再也找不到安身之处了。奎富无奈只好再回到家乡，给地主当小长工去。

同山峰上的杜鹃花,已经几开几落;同山村上贫苦农民的日子,是越来越苦难了。到了一九四八年,奎富度过了悲惨的少年时代,已经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了。然而任凭他没日没夜地一年干到头,还是还不清债,吃不饱饭。妈妈和弟弟仍在受苦。眼看着在家乡还是活不下去,奎富只好托在上海做工的堂叔,给他在上海找一口饭吃。堂叔知道奎富一家的处境,答应让他到上海后再为他想办法。奎富妈妈不指望乡下会有好日子过,就让儿子第二次离开亲人去闯上海滩。

飞驰的列车,茫茫的田野,引起奎富的阵阵思索。这些年来,他多少次盼望能过上不挨饿、不受欺的日子啊!可是一次次的愿望,都被残酷的生活击碎了。这一回去上海,究竟能不能争到一个好日子呢?

到了上海,奎富好容易找到了堂叔。堂叔托了不少人情,经过许多周折,才算把奎富介绍到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当临时工。

进厂之前,堂叔告诉他:这家公司有一千多个职工,据说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党的善后保管委员会合办的。孔祥熙是股东老板,蒋经国是公司的经理。所以,这个厂规矩严厉,人员复杂,要格外小心。

第二天,寿奎富在介绍人的陪同下,来到“主管”那里报到。“主管”打量一下奎富,皱着眉头问道:“刚从乡下来的吗?”

介绍人连忙说:“他在杭州厂里做过工,很能干的。”

“主管”接着说:“现在先做做杂务再说。公司里有美国经理和美国顾问,你别呆头呆脑,要懂点规矩,看到办公室里男的要叫先生,女的要叫小姐。”

从此,他每天清晨,要在那些美国顾问和高级职员未到之

前，把他们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给这些先生、小姐们冲好茶水，倒清痰盂。要是稍迟一步，轻则挨训斥，重则停生意。这些事情干完后，接着就要扫马路、倒垃圾、通阴沟、搬器材，每天干得他精疲力尽。这些重活，他都能顶，可是美国佬和那些“高等华人”们的侮辱，却使他难以忍受。有一天，他在打扫技术室时，看到设计台上的图纸画得花花苗苗，就好奇地过去张望了一下。这时正好几个穿西装的“先生”进来，他们看到这个“下等”的扫地小工张望他们设计的图纸，好象有损他们的尊严似的，便恶意地嘲笑道：“你看懂了吗？要是看不懂，就回去叫你娘老子给你喝上二十年墨水再来吧！”另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先生”冷笑一声说：“你只认得扫帚横在地上是个‘一’字，这里可没你的事！”接着又有一个美国顾问走进来，见了奎富就把手帕捂住嘴巴。那些穿西装的先生们向美国顾问说了一阵洋话，就对着奎富哈哈大笑起来。奎富看得出这些先生们在嘲弄他，便愤慨地转身离开了技术室。

那时，“中农”公司里的美国经理，把中国工人看得比狗还不如。有一次，工具间有个工人师傅因家里发生火灾东西被烧光了，向公司要求借三十元钱。结果美国经理连一分钱都不同意借。可是美国顾问的一个女秘书带来的一条哈叭狗在厂里跑失了，公司却登报悬赏一百元美金进行招寻。

那时候，工人的生活一点都没有保障，随时都可能被开除解雇。有一天，美国总经理窝勃雷姆的小汽车开进厂门，运输科的一个工人稍为让得慢一些，使汽车刹停了一下，这个经理先生就钻出汽车，大发雷霆。他挥舞着“司的克”（手杖）把中国工人恶狠狠地辱骂一顿，并在当天把这个工人的厂牌收下来，以阻挡美国经理先生的汽车为“罪名”，就给开除了！



奎富面对这些不平的事情，心里象有一把把烈火在燃烧！每天，他在黄浦江边倒垃圾，看到江心停着一条条飘着星条旗的美国兵舰，一门门大炮，翘起黑溜溜的炮筒，就象一条条窜出洞口的大毒蛇，张着血口要咬人似的。

寿奎富凝视着黄浦江，心潮比这江潮更不平静。一个个问号，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为什么穷人到处受欺压？为什么美国人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不法？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有空的时候，寿奎富总是要偷偷地到车间里去看一看。看到这里所生产的大都是一些锄头、铁镢之类的小农具，其他能称得上机械的，也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打谷机。他向一个老师傅问道：“老师傅，这里还造些什么农业机械？”老师傅知道奎富是新来的，就关切地告诉他说：“这个农业机械公司是挂名的，实际上是美国剩余物资的推销站，他们用那些过时的机器，搜刮我们中国人民的血汗！”奎富听了老师傅的话，明白了好多事情。车间里的老师傅看到奎富是个刚强的小伙子，人又那么诚恳，所以下班时碰到一起，都欢喜和他交谈，告诉他工农是一条藤上的苦瓜，要他和车间里的师傅们齐心协力，这样就不怕美国顾问和车间“主管”们的欺压了。

转眼间，已经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不断传到上海，“中农”公司各车间的工人都在相互转告：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一月底解放了北平；国民党几十万匪军，在淮海战场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现在解放军要打到江南来了，天要亮了，穷人就要翻身了！

乌云驱散了，太阳出来了。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了。

这一天啊，红旗飘舞，万众欢腾，全市人民涌上街头，热烈欢迎逐鹿江南的人民子弟兵。当军管会派出的军代表来到“中农”公司时，寿奎富和老师傅们紧紧握住亲人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我们劳苦人民出头的日子可盼到啦！”

军队代表也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这个工厂的主人啦！”

主人！这是多么自豪的称呼啊！多少年来，“主人”这个崇高的名词，却被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地主、老板们窃用着。而今，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把被颠倒了乾坤又颠倒过来了！劳动人民不再是牛马，而是主人啦！经历了二十多年奴隶、牛马生活的寿奎富，今天扬眉吐气了，第一次被人称为工厂的主人，这是多么使他激动呵！他禁不住满腔激情，和同志们尽情地欢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 发愤硬攻文化关 誓为革命攀高峰

解放后，工厂里一切都起了根本的变化。那些骑在工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官僚买办阶级的代理人被赶跑了，管理工厂的是工人自己的代表和人民子弟兵的代表。寿奎富也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半年以后，领导上又把他调到车间里去学做铣床。并挑了一个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老工人当他的师傅。寿奎富深切地体会到，这是党组织对他的培养，自己应该奋发学习，好好为工人阶级争口气！在师傅的帮助下，奎富在思想上和技术上进步都很快。不到一年功夫，就能独立操作铣床了。这一年，他还光荣地被批准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

员。在团组织的教育下，使他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他决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这一天，奎富上夜班。车间里正在突击加工一批治淮工程急需的机件。他刚刚接班，工段长就急匆匆地拿来一只伞形齿轮的坯件，要叫寿奎富连夜铣齿。这个伞齿轮直径有两百毫米大，是治淮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机件。寿奎富过去从未加工过这种齿轮，今天领导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这将使他得到更大的锻炼。所以他干劲十足地准备出一身汗，把这个任务攻下来。可是当他翻开加工图纸时，心里急起来了。原来技术科的工程师没有在图纸上标明加工伞齿轮的分度挂轮及角度调准的尺寸。寿奎富文化水平低，不会计算，齿轮就无法加工。这时，日班刚下班，他一看时间，厂里的交通车还没有开，还能找到技术科的那位工程师。想请他计算一下，自己可以马上加工。寿奎富急忙奔出车间，到厂门口一看，那位工程师正坐在车厢里。他急忙向工程师说明来意，要求他马上去帮助计算一下。那位工程师听完，“客气”地说：“对不起，今晚我家里有事。你等不到明天，就自己到我办公室去看一下，写字台上有两本书，你要求的東西里面都有。”

奎富还想再要求一下，可是汽车已经开走了。他来到办公室，在技术科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找到了那两本书，但翻开一看，里面那些一根根黄豆芽似的外文符号和数字公式七颠八倒地横在他眼前，象在有意嘲弄他似的。他只好合上书本，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铣床边，望着地上那只伞齿轮的坯件发急。上夜班的老师傅不多，大家也算不出这只特殊规格的伞齿轮分度尺寸，只好叫奎富留待第二天日班再加工。这一夜下班，奎富连半夜饭也不想吃，闷闷不乐地回到宿舍。解放以来，他

第一次感到心情这样沉重。他难过地想：“党交下来的突击任务，我没能完成，这怎么向党交代呢？”他和衣躺在床上，思潮象江海奔腾。车间里那只没有加工的伞齿轮，技术科那两本厚厚的洋书，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这齿轮、这书本，仿佛在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寿奎富呀！你纵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朝气蓬勃的干劲，可是现在你却象少了一个轮子的汽车，开不了呀！”这究竟说明什么呢？想到这里，他从床上呼地坐起来！心头就象有千百只战鼓在急擂。他深切地感到，解放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可是在文化上还没有翻身。科学文化知识还被别人垄断着，这个领域的大权还抓在别人手里。因此，这种状况存在着，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继续前进，就不可能最后得到解放。于是，他把这次领导上交给他加工这只伞齿轮坯件，看成是向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斗任务：工人阶级一定要在文化上翻身！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让社会主义建设大步向前迈进，已经成了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必须攻取科学文化这个阵地！千百年来，劳动人民不仅被剥夺了自己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世世代代受冻挨饿，而且也被剥夺了自己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祖祖辈辈没有文化。现在要夺回这个阵地，当然必须付出艰苦的代价。但现在的寿奎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孤苦无依的放牛娃了。在他的背后，有着自己的整个阶级，有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支持！因此，他坚信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付出任何代价也不怕！

第二天一早，他就向团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团组织全力支持了他的要求。当天就派人到区里联系，保送他到上海五金工会办的职工业余技术学校去学习。

当时，国家的经济尚在恢复时期，厂里还没有办起业余技术夜校，他必须每天步行好几里路到五金工会办的那个职工业余技术学校去学习。然而，这些都动摇不了奎富为革命发愤学习的决心。他认识到，这不仅是为了学习一点文化知识，而是一场革命，一场为工人阶级夺取科学文化阵地的战斗！为了及时赶到学校上课，每天下班后，他就象一名田径运动员似的，一路飞步奔到学校。这样有时也还是要迟到。于是，他又省吃俭用地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一下班，澡不洗，饭不吃，在饭盒子里装了一点冷饭就往学校里赶。等到第一节课上完后，利用短短的几分钟休息时间，一面抄着课题，一面吃着这顿犹如战火中的晚餐。在那严寒的冬夜，他吃着冰冰冷的饭，可是心里却觉得滚滚热。他那颗年轻的心，为一个伟大的革命目标吸引着，照亮着，推动着他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时间，向着科学文化的山峰攀登。

对于寿奎富来说，学习上的困难确实不少。数学上那些抽象的公式和复杂的计算，实在太难懂了。有时一个习题，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还做不出来。但是，寿奎富从来都没有在这些困难面前退却。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起那只无法加工的伞形齿轮坯件，那两本厚厚的洋书，想起寿财主的牛棚和同山背后的土地庙。于是，一股革命的烈火就在他心里腾然而起，给他以无穷的智慧 and 力量。

寿奎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把学习的知识联系车间里的生产实践，成果就出来了。需要用三十几个公式才能计算出来的一种复杂的齿轮分度尺寸，他能很快地计算出来了。

寿奎富是多么高兴啊！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这一点成绩。他渴望的是工人阶级在科学文化上的彻底翻身！

因此，他决心不停步地继续前进。一九五二年，厂里办的业余学校，也增设了数学、制图等专业课程，奎富就在厂里的夜校继续读书。那时，有好多大学生分配到厂里当技术员，奎富就把宿舍搬到这些大学生那里去。那些大学生看到工人师傅学习劲头那么高，态度又那样虚心诚恳，也都很热心地帮助他。

市郊军工路上的夜晚，是分外宁静的。只有夜班的机器声，在静夜中回荡着。厂区的宿舍里，电灯一盏盏地熄了。然而在寿奎富的床旁边，一盏遮着纸罩的电灯，仍然亮着，灯光下，奎富正在聚精会神地做习题。他把翻身激情凝笔尖，满腔热血化墨汁，在飞驰的时间中，抢攻文化关，那笔尖划在纸上的“嚓嚓”声，不就象他急速前进的脚步声么？

## 顶风破浪接重任 壮志红心绘新图

一九五四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上海机床厂里一片欢腾的锣鼓声，人们向各个车间传送着一件大喜事：厂里选拔的第一批工人技术员今天要开进技术科了！

这是解放后又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呀！老师傅们来不及擦净手上的油污，就喜气洋洋地欢送这支工人阶级自己的技术队伍奔赴技术科。这支队伍中，有一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他穿着一身沾着油渍的工作服，头戴解放帽，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他就是铣工寿奎富。

奎富接受这个任务后，心里一直没有平静过，支部书记叮嘱他的话，在他心头震荡：“你们是第一批调到技术部门去的工人技术员，是开路先锋。但这条路并不是平坦的，党希望你们当好先锋，作出榜样，向技术设计的阵地勇敢地进攻。这是

党的期望，阶级的委托。”支部书记接着又交给奎富一篇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并叮嘱说：“毛主席对我们工人阶级寄予极大的希望和信任。希望你在新的战斗岗位上认真学习，好好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奎富接过毛主席的书，心头就象增添了排山倒海般的力量。他有多少话要向党组织倾诉呵。最后，他把万语千言化成一个决心，就象宣誓似的说：“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

当晚，他认真学习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的每一句教导，就象大海灯塔照航程。寿奎富越学心里越感到亮堂。当他学到“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几句时，周身热血奔腾！他觉得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就要以这个阶级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才能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他感激党组织在他投入新的战斗以前，给了他强大的思想武器！

此刻，这一阵阵欢送的锣鼓声，又包含着同志们的多少期望的心情呵！一个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寿奎富说：“别忘记，工人大老粗坐技术大楼这可是个开头啊！”

寿奎富坚定地回答说：“我一定牢记师傅们的话！”

寿奎富和同志们来到了技术室，受到革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对技术室的工作，奎富是陌生的，然而对这座技术楼的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张设计台，他却是十分熟悉的。解放前，他曾握着扫帚，扫遍技术室的每一个角落，他曾拎着铜壶，为每一张写字台旁的先生、小姐们冲水倒茶。这里的每一扇门窗，都是最好的见证：他——旧社会一个扫地小工，在这儿受了多少欺凌！而今天，他——新中国的主人，带着阶级的委

托,党的期望,来占领和改造这座技术大楼了!当然他也深深地懂得,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要真正占领这个阵地,今后还有着许多艰巨的战斗。在党的教育下,奎富对这一点是有了精神准备的。

寿奎富和几个工人技术员被安排在设计科工作。他的具体任务是和另一个师傅一起核对图纸尺寸。由那位师傅在实物上量尺寸,寿奎富在图纸上勾红笔。这对技术室的设计人员来说,是最简单的工作。可是对于寿奎富来说,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原来他在车间加工时看的图纸比较简单。而现在是整套的磨床图纸,有侧面图、正视图、剖视图等等,把寿奎富一下子弄得眼花缭乱。每次那位老师傅都把实样的尺寸报了几遍,奎富却还没在图纸上找到位置。他急得心如油煎,满头大汗。在车间里,寿奎富是个有名的小老虎,而现在他却象老虎落在深井里,有劲使不出。他想到党和同志们的殷切期望,心头更是急如火烧。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吹出一阵冷风,什么“设计与扫地相差十万八千里”啦,什么“扫帚和笔杆不是一个东西”啦。这些话,就象尖刀刺心肺,使他心里难受极了。在困难面前,毛主席的著作给了他力量。他又一次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打开书本,几行金光闪闪的大字映入他的眼帘:“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晚上下班后,他继续留在设计室里,把图纸和实物一齐放在面前,一条线一条线、一个面一个面地进行对照。他全神贯注,废寝忘食,常常把夜班吃半夜饭的铃声误认为中班吃晚饭的铃声,直到听见窗外枝头的鸟叫声,他才知道又度过了一个通宵。有多少个夜晚



呵，他就是这样为革命事业熬通宵，拚命钻！经过四个多月的刻苦钻研，这个看图纸的困难，又被突破了。

一个困难越过了，另一个困难又横在寿奎富前进的道路上。在比较复杂一点的设计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外文资料或标着外文的符号。寿奎富是在解放后才开始学习文化的，对于外文，真可算是目不识丁。因此，在一些外文技术资料面前，他只好看着发呆。这时，有人以为又有指责的根据了，他们说：“不懂ABC，怎能搞设计？”奎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敢来占领技术楼，也就敢去掌握ABC！”于是，他就和几个工人技术员一起到业余英语补习学校去报了名。在学习中，他把一些名词和生字都记在小卡片上，带在身边，利用上班的路上，午休的时间，拿出来一个个地反复温习。翻了身的工人，就是有着这样一副革命的硬骨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奎富不仅能够自己制图设计磨床部件，而且也能初步独立地研究一些外文资料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他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一九五六年，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庄严地对着毛主席像，对着鲜红的党旗宣誓：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从此，他更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在设计图纸上倾注着自己的全部心血。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亲自视察了上海机床厂，红太阳的光辉照耀着寿奎富和他的阶级弟兄们前进的道路。寿奎富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意气风发地大步向前迈进。一九五八年，他和同志们一起，深入车间调查研究，大胆地对一些仿制产品进行开刀，得到了不少的收获。业余时间，他仍是孜孜不倦，分秒必争地学习着。这一年，他在夜校高中毕了业，又参加了工厂里举办的业余工人大

学。在为革命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征途上，他从来不知疲劳，不肯停步休息。

一九五九年初，国家把自行设计和制造一种新型的高精度螺纹磨床的任务交给了上海机床厂。这种产品，在我国机床制造工业中还是个空白。但它却是发展航空、仪表和国防工业急需的设备。工厂党组织经过研究后，决定建立一个以工人技术人员为主体的“三结合”设计小组，来担当这项重要任务，并任命寿奎富为主任设计师。设计的定额工时原定七个月，但领导要求他们能在三个月内完成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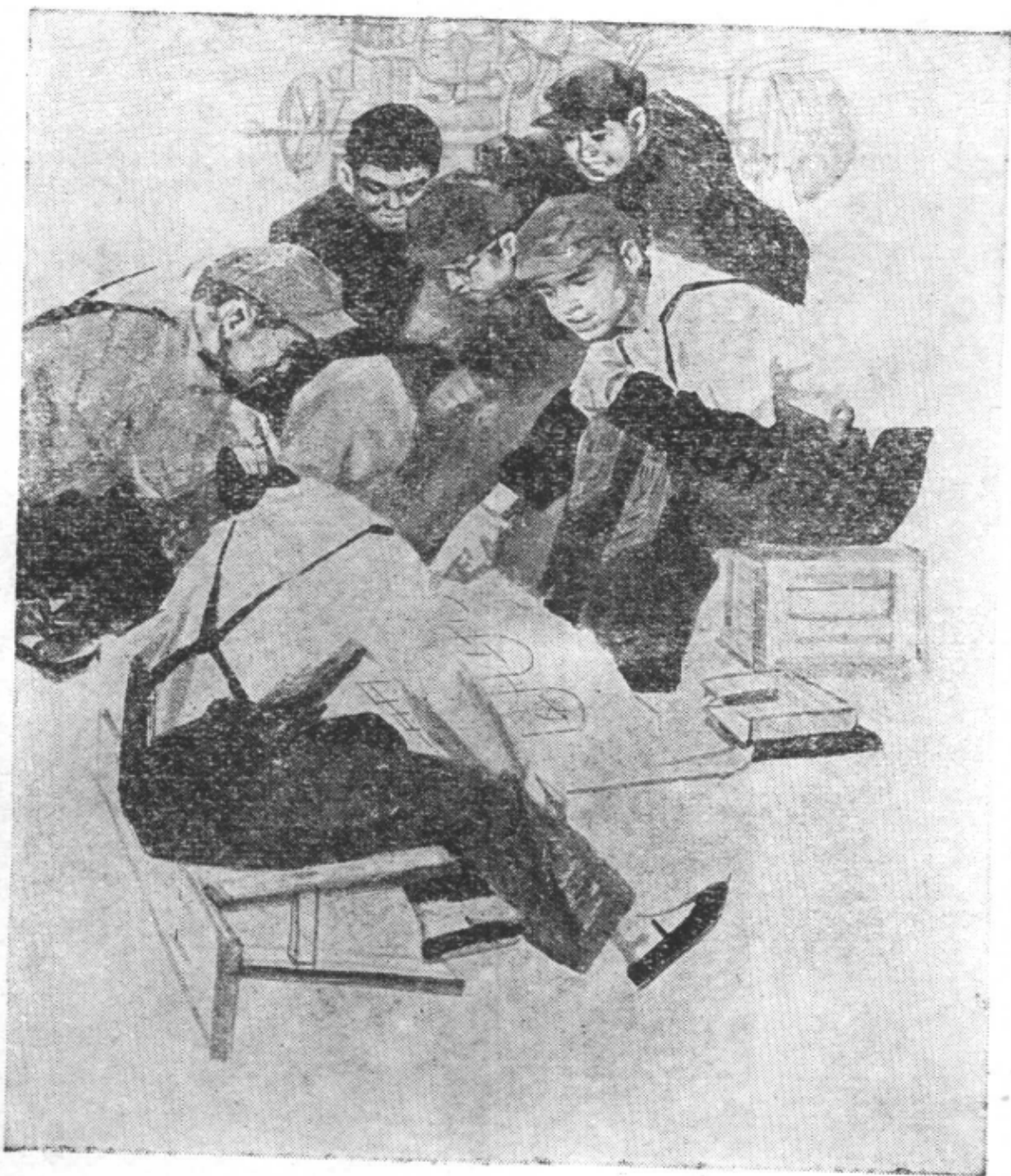
寿奎富接下这个任务，心中说不出的激动。领导上把这样一项重任交给他，这是对他、对工人阶级的无限信任。在重担面前，他毫不推让，更不退缩。但是他又不能不考虑到这副担子的分量。他知道，有多少人在以不同的目光和不同的心理看着他们。厂党委鼓励他说：“奎富同志，这个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一定要为工人阶级争气，为党为毛主席争光！”奎富果敢地点点头说：“有党的领导，我们就有信心打胜这一仗！”

本来，有些人主张先向国外买进一台同类型的产品来进行仿造。现在他们看到领导上竟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一些工人技术员，而且让一个扫地工来担任主任设计师，这不是开玩笑吗？更使他们想不通的是，寿奎富这个人竟敢不自量力，毫不推辞地接下这个重任！他们也知道寿奎富正发愤上大学，刻苦钻外文。但是在这种厂办“野鸡大学”里究竟能学到多少学问呢？而且，他们寻根找据地说：“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普通磨床发展到精密螺纹磨床，经历了七、八十年的时间，而你们只有几年的经验，却要在三个月内设计

出这样高精度磨床!”所以他们认为寿奎富是“头脑发热”。

当然那些先生们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困难确实是不小的。奎富请教了一些老工程师,找了一些国外资料,也不过是几份这类同规格磨床的简单说明书和几张外型照片。别的就什么也参考不到了。但是,那些先生们在新时代面前却是瞎子。他们看不到当家作主后的整个工人阶级的能力,更看不到伟大的革命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这些“大老粗”的精神世界里引起的深刻变化。面对这些困难,寿奎富和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等著作。毛主席的教导,给三结合设计小组全体同志增添了必胜的信心,大伙儿说:“我们缺少书本上的资料,但是我们有车间里的广大老师傅。群众的生产实践,就是我们设计人员最好、最活的资料。”

在设计过程中,一个个困难接踵而来。有时为了一个部件也使奎富想得头脑发胀。在这困难面前,党委又给了他有力的支持,领导深入到三结合设计小组,了解设计中的问题,组织他走出去搞用户访问,并坚定地对工人技术人员们说:“这次以我们工人技术人员为主体设计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螺纹磨床,意义是很深远的,实际上这是一场工人阶级在科学设计阵地上争夺发言权和领导权的斗争!我们要进攻到底!”车间里的老师傅知道了奎富他们在设计中碰到了“拦路虎”,也纷纷到设计室来对奎富他们说:“一人不如二人计,三人出个大主意。有困难我们一起来攻!”技术科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也热情地帮助奎富找资料、出点子。党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给奎富增添了巨大的力量,他感到面前就是有千难万险也能冲得过去!他们广泛深入车间,利用一切机会找老师傅一起研究设计方案。下班后,休息日,车床边,宿舍里,他们带





着草图，拿着铅笔，三个一摊，五个一群，到处寻师访“贤”，愈谈愈有方向，越干越有劲头。终于以两个月零十三天的时间，设计成功了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螺纹磨床。经过车间里突击加工，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螺纹磨床，在六十年代第一个春天胜利诞生了！

上海机床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螺纹磨床的喜讯传出不久，四月三十日，上海各报又登载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上海有一百多位工人，被任命为工人工程师。在这个大红榜上，上海机床厂的寿奎富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张张套红的报纸，飞向全国；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也以特别激动的声音，向广大人民欢呼无产阶级技术队伍壮大成长的喜讯。

寿奎富在同志们的热烈祝贺声中，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一个放牛娃，在生活的道路上走过了三分之一一个世纪，从茫茫黑夜一直走到旭日东升。在他的成长中，哪一步不饱和着党的心血、阶级的期望和毛主席的无限恩情啊！在这热情的祝贺声中，他清醒地认识到：决不能停下步来！征途上还任重道远，许多新的战斗还在后面。他，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决不能忘记过去，决不能忘记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忘了这些，那就是对工人阶级的可耻背叛！

是的，在为革命攀登科技文化高峰的道路上，寿奎富正和自己阶级兄弟一起，继续大步前进着。一九六五年，他终于读完了工人业余大学。十五年啊，整整的十五年！他冒着风雨，顶着寒暑，“人不留宿，马不停蹄”，一鼓作气地走完了这段路程。但他抬头远眺，觉得这还仅仅是万里征途中的第一步啊！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高潮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千万个寿奎富正在各条战线上迅速成长。他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昂首阔步，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插到上层建筑的每一个阵地！

上海机床厂工人写作组整理